

群衆

發行 羣衆週刊社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
 中郵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本報零售每份三角
 預定連郵
 三月九期一元六角
 半年十八期三元
 全年卅六期五元六角
 國外加倍

版出日七月七年九十二國民

★ 期八十第 · 卷四第



譯 張

念 紀 年 週 三 戰 抗

號二十街三四段重

★ 報 日 華 新 ★ 處 售 經 總

社論

慶祝中共十九週年紀念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九週年的紀念日。

中共十九年來的歷史，是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奮鬥的歷史。正如王明同志在四年前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共產黨十五年奮鬥的歷史，雖然在中國革命各個階段和時期中，根據主觀及客觀條件的變動，有過各種政策和策略上的變更，但實際上就是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十五年的歷史。」

從十五週年紀念到現在又有四年了。在這四年中，中國共產黨所呈獻給國家與民族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實現，是協同友黨友軍努力於抗日戰爭的支持，是在動員全黨同志為抗戰的最後勝利而鬥爭！

馬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是國際主義的。但在民族解放戰爭中，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密切地聯繫着。「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對於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全力援助將領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實無旁貸，在這裏，不能有一點消極，理由是：只有為着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因此，「我們黨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口號！後來又提出了與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毛澤東同志論新階段）

抗戰三年以來，中共的同志，無論在前線，在後方，在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都是在這種指示之下而努力工作着。特別當抗戰處在每一個困難的關頭，黨無一次不正確地以切實的口號，來號召全國人民為克服困難而鬥爭。這種切實的事實，證明中共乃是中華民族解放鬥爭中一支最有力的隊伍。

在軍事方面，中共領導下的第八路軍與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提供了很大的貢獻。在將近三年的抗戰中，八路軍與新四軍所進行的戰鬥，大小共四千餘次；八路軍與新四軍殲滅敵人槍支共達四萬餘枝；八路軍與新四軍所俘虜的日偽軍共達二萬餘人；八路軍與新四軍傷亡的將士共達十萬餘名；八路軍與新四軍在華北與華中的游擊戰，拖住了敵人的尾巴，拚鬥了日寇在華軍隊十七個師團，佔其全數的五分之二，粉碎了敵人的進攻。「這是戰鬥的成績，但他們不僅戰鬥，並且進行各種抗日工作。八路軍新四軍收復失地數十萬方里，並在這些地區上建立起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域，中外聞名的五台山抗日根據地就是模範的一個例子。在這些地區中山路軍新四軍組織了數千萬的抗日救國隊，數百萬的自衛軍，數十萬的地方武裝和游擊隊。在這些區域

中，政權民主化了，抗日的政策實行了，民衆生活改善了，抗日積極性提高了。這些區域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粉碎了敵人的「進攻」，頑強的在敵人後方支持着。」（王稼祥同志語）

在內政方面，陝甘寧邊區的民衆在中共與邊區政府的領導之下，已經一步步朝着民主政治的大道走去。在那兒，各級政府已經民主化，生產運動不斷地在進行着；一般民衆的生活已經相當的改善；掃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已經大踏步的前進。邊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乃是我們能夠自力更生的一個例證。這樣的發展，對於民族國家，是極端有利的。

總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是民族解放運動中一支強有力的部隊。正在抗戰處在十分困難十分嚴重的關頭，我們紀念黨的成立十九週年，的確是有重大的意義的，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光明前途，我們不僅僅只作文字上的慶祝，而應當在實際工作上，發揮同志們在民族戰爭中的模範作用。「在八路軍與新四軍，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範，執行命令的模範，紀律的模範，政治工作的模範與內部團結統一的模範。共產黨員在與友黨友軍發生關係中，應該堅持統一團結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範。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要傲慢態度，誠心誠意地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係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收報酬的模範。共產黨員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是民衆的朋友，而不是民衆的上司，是每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毛澤東同志論新階段）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為了工農大眾的利益，我們的同志必須這樣做，而且

只有選擇，才能克服半途而廢的危險，才能使我們的抗戰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抗戰三年

抗戰三年，國際國內發生了許多大變化，對我們的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提供了非常豐富與休憐的教訓。

國際方面那些迅速而出於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大變化，不容置疑地說明了目前的時代是戰爭惡魔與和平互力搏鬥的時代，一方面是還很強大的以侵略戰爭為唯一續命湯的帝國主義體系，一方面是奮發怒發的世界和平力量。各在運用自己的政策，和對方作着誰勝誰敗的戰鬥。

在這裏，拒絕集體安全制，拒絕對侵略者作集體制裁，拒絕真心誠意地站到和平堡壘來精誠合作，就要自食惡果，這在現在已不用去說的了。在這裏，強大了，不依靠和平堡壘而依靠在現在看來還是強大的「外力」也會使自己亡國的，如捷克，如奧地利；在這裏，強大了，不依靠和平堡壘而仰望着看來還很強大的外力來支持，也不能使自身中立於戰禍之外，而要受人利用，使人民受到無謂的損失的，如過去的芬蘭，在這裏，強大了，而且還在證明着，能等及時的改變「外交路線」，堅決的與和平堡壘在一起，而不再存暗算，就可以遠離戰禍，努力建國如愛、立、拉三小國等等。所有這些教訓，要求着希望自己能走上光明而不墮入黑暗的弱小民族去衷心學習的。

中華民族的秀優兒女，是用自己的血肉在反對侵略，反對侵略戰爭。這就把中國和世界和平堡壘連結在一起。堅決抗戰下來三年，把敵人消耗了，

慶祝黨的成立十九週年，我們必須集中一切力量為堅持抗戰到底而鬥爭！

削弱了，使自己進步了，有許多非常迅速的進步現象，雖則這還是很不平衡的，不夠的，還沒有倒轉日寇與我們在力量上的對比。三年堅決抗戰，證明只要我們能夠團結，我們是有力量把敵人打出去的；只要我們能夠使民衆積極的動員起來，我們是有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只要能夠力行民主政治，力求進步，民衆的積極性是很大的，是能夠發揮出驚天動地的偉大力量的——總之一句，只要能夠真正進步，團結就能堅固，民衆就能更積極，堅持抗戰一直到徹底勝利是沒有問題的。

三年來國內的變化，是在說明和平的力量是飛漲起來了，和平的敵人則在走進墳墓；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作用是提得很高了，和蘇聯改善關係以至願意忠實於這種改善的國家是一天多似一天了，中國的民衆力量已部份地振發起來了，而和平的敵人，則有的已歸慘敗，有的也在左支右絀，忙亂倉惶。

然而，這敵人還是強大的，他們統治下的人類勞動所已創造出來的財富與一切物質力量還緊握在他們手掌之中，他們還在儘力張羅着，現在施展各種各樣的陰謀偽計，或利誘，或威逼，來破壞和平戰線的團結，來使自己逃出死亡的命運，拿我們的直接敵人日寇來說吧，它雖然已被我們的抗戰愈打愈弱了，但它正在四面圍剿；對我們企圖「以戰養戰」，「以華滅華」，對歐戰則企圖利用時機冒險南進。它的花樣還正多着。

敵人這種狼奔豕突的掙扎，能說它不會有什麼

成果嗎？還不能。如把「愈打愈弱」這句話了解得太簡單了，把它太強調了以至誇大了，以為敵人「不久將自斃」，那是很危險的。敵人可以由我們的全面抗戰而愈打愈弱，也可以由於我們的偶或懈怠或疏忽而轉弱為強。侵略戰爭者必歸滅亡，保衛和平者的必歸勝利，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歷史的必然性，但主要還要看反對侵略戰爭者的努力程度。是的，敵人那種「以戰養戰」，「以華滅華」的毒計是我們所應當使它毫無所獲的。但我們在這點上到底努力得怎樣？我們要有勇氣正視事實，從事實上來審察一下。我們的資金滯留在上海以及類此城市的現在到底有多少？其已經流入敵人之手而供其利用的又有多少？我們的資財物力「漏」到敵人手裏去的又有多少？人力被它誘去或迫去供其驅使的又有多少？其中有意無意地充當了「以華制華」的執行者又有多少？這是值得在抗戰三年的今日，深深審察一下的。

爲了加強自己的努力，同樣也有檢查一下我們的「愈打愈強」到底強到什麼程度的必要。我們常常說，「我們是愈打愈強」了。這話是不是可以說的呢？可以。但是把這話說得太順口了，動不動，

(下接四九九頁)

| | | |
|---|------------------|---|
| 社 | 慶祝中共十九週年紀念 | |
| 論 | 抗戰三年 | 梓 |
| 論 | 爲抗戰建國服務的新文化運動 | 許 |
| 論 | 向華北敵後學習 | 許 |
| 論 | 抗戰第三年的財政措施 | 許 |
| 論 | 三年來的敵軍 | 英 |
| 論 | 論第一次中日戰爭 | 楊 |
| 論 | 論內戰 | 邊 |
| 論 | 聯共(布)黨史研究資料之廿八 | 章 |
| 論 | 一九〇五年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下) | 戈 |
| 論 | 戈實權譯 | 實 |

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新文化運動

日寇企圖滅亡全中國，不只在用着它的飛機、大炮、坦克等殺人利器，同時也在用着誘降、分裂等政治陰謀，而敵寇漢奸對同胞奴化、腐化的文化政策與文化活動，就是這種政治陰謀中的一個「攻心之術」。

因此，我們的抗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獸驅逐出中國，決不只是軍事上的克敵制勝，主要的還是政治上的力求進步，振奮自新。這就是「我們的抗戰，同時就在建國」這句話的意義。三年來的新文化運動，就在這力求進步振奮自新的抗戰建國中，帶着它反帝反封建的反侵略偉大任務。

一、敵寇漢奸的奴化政策與奴化活動

配合着敵人侵華戰爭開始時妄想的「不戰而勝中國」，「三個月滅亡中國」這種「速戰速決」的戰略，起初敵人的文化侵略，是採取對我文化的消滅政策。攻佔我文化中心城市，摧殘我文化機關，殺害我文化工作者，焚燬我文化財富。當時它在佔領區所做的毀滅，單只教育機關的財產損失一項，總數就值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九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元之巨，而全國圖書館大小四千個之中被敵摧毀的竟達三分之一，圖書被劫的公、天達七十餘萬冊，上海世界書局總印刷所裝訂成冊的書籍，前後被敵運走三批，共有五百萬冊，而上海東方圖書館與天津南開大學的全部被燬的損失還沒有算在裏面。

平型關、台兒莊、敵寇開始受到了我們的痛擊，「速戰速決」之幻夢已非，當徐州會戰後，它的駐滬新聞記者就對敵寇提出警告，說：中國內部的團結正蘊藏着巨大的力量，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非常強烈，把握不到這一些而對戰爭前途妄為評價，還是非常危險的。

由於「速戰速決」這一戰略的放棄，敵人的文化侵略也就改變了方向，積極地採取了有系統、有計劃的奴化政策。首先，它在專以滅亡全中國為職責的「興亞院」內設立了統籌對華文化侵略的「文化局」，而於北平建立具體執行這個奴化政策的「文化局」。在廿七年五月，由穆逆斌負責，舉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奴化運動，所謂「大新民運動」。這一運動，主要是以各縣為中心，各鄉村為單位，成立所謂「新民青少年團」，把自十二歲到十七歲的華北男女同胞都組織在「少年團」內，把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男同胞組織在「青年團」內，而同年齡的女同胞則組織在所謂「新民婦女會」內，這些強迫成立的組織，在敵偽心目中就成為建立華北偽政權的「社會基礎」，它妄用這些組織作為基幹來宣傳與推行它的所謂「新民主主義」，並且就在這個「基礎」上成立起它施行奴化政策的大本營——「新民會」。

接着，敵偽又在北平、天津、濟南、石家莊等地舉行了第二次大規模的奴化運動，所謂「剿共滅黨週運動」，大規模搜查了各學校，各圖書館，各書店，把所有關於共產黨、國民黨的一切圖書席捲而去，同時強迫的發行了「大批的」它的所謂「告中國青年書」，「告中國農民書」以及「中國共產

黨的罪惡」「反共新手冊」等小冊子，定為「人民必讀之書」，它想「這樣，中國人的思想，總該可以「純正」起來了！」

在「新民會」的策動之下，敵偽漢奸在華北各地就大量編印各種漢奸報紙、雜誌、叢書、課本；大量開辦「師資訓練班」，「講習會」，從中派出教員到各地小學去教授它所編印的課本；大批設立日語學校。

與華北「新民會」同一組織，同一性質的，在華中華南有所謂「大民會」。

在這個會的驅使之下，到廿八年年底為止，在受着奴化教育的小學生，北平有十萬以上，上海有兩萬以上，江蘇有七萬五千左右，武漢有三千，蒙古有三千左右，浙江、安徽、廣州、廈門等地則共有小學一百四十四所。日語學校，在北平有八十餘所，在天津有七十餘所，在江蘇連附設於中小學校的共四十餘所，在廈門有三十五所，廣東有六七十所。奴化日報，在中國已共有一百卅六種，分佈地區則有平、津、滬、寧、漢、粵、港、蘇、浙、皖、贛、湘、魯、晉、冀、察、綏、遼、吉、黑，而平、津、滬為最多，各為十七、十、十五種。其他刊物，有雜誌三十種以上，叢書四十餘種，教科書不計。

這些奴化活動，其中心自然就在宣傳其所謂「新民主主義」，而「新民主主義」的內容則主要是「反共滅黨」，「日支一體」，「東亞和平」，「反共和平」，「和平建國」，「日支親善」等等荒謬「理論」。

汪逆精衛之流公開叛國以後，敵寇漢奸的文化侵略顯然又更進了一步。這批奴隸，（不，照高爾基的說法，應該說「這批牲畜」，因為奴隸還在變

成「人」呢？做起奴化活動來，比他們的主子更更下流，他們一手捏着日圓，一手捏着手槍，逼迫校長、教員、學生、新聞從業員做他們的嚶嚶。最出色的一點，就是把主子的反對三民主義改換為偽造三民主義，把「滅黨」改換為「護黨」，而把「反共」則改為「劃共」。

敵偽漢奸的奴化活動，顯然是和侵華戰爭的進攻策略，逐段逐段的配合着的。不管它們所有那些奴化活動到底受到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強烈的反抗與打擊，如香港反汪工人的罷工，上海許多學校的學生的全體罷課，有些校長教員與日報堅決拒絕收買，平津小學生不肯閱讀偽編教科書等等，但三年以來的奴化活動，不可否認是有其相當效果的。它的所以能有一些效果，是在於它是利用了我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些落後思想、習慣與制度，如復古、迷信、尊孔等等。這就說明了我們的新文化運動，有絕對不宜定的道路是有那一些。

二、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

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是服從於抗戰建國的政治目的，是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是抗戰建國的一種重要的鬥爭武器。在抗戰的第一階段中，時承敵人的瘋狂摧殘之後，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任務，在組織上是發動陣容與分配力量，在內容上是打破投降「理論」如「唯武器論」，「三月亡國論」等等，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與堅定對抗戰勝利的民族自信心。從北平、上海、南京等文化中心相繼淪陷起，一直到保衛大武漢止，在這一時期內，我們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文化機關與文化工作者的後撤，同時分佈到各省內地，建立了重慶、桂林、昆明、延安、金華、吉安等新文化根據地，成立

多數的宣傳隊，服務隊，工作隊等等，跑進了鄉村，跑上了前線，這樣來建立起與擴大着抗日的文化統一戰線，而成立了戲劇界，歌詠界，漫畫木刻界，文藝界，教育界等等全國性的抗敵協會；另一方面是大量出版各種雜誌，小冊子，開發抗戰建國必勝必成及其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與障礙的理論，大批的文化工作者向四面八方分散出去從事於話劇，歌詠，小型報紙，演講，戰時教育等等的活動，使一般人民了解抗日戰爭的意義及其任務的莊嚴與艱苦，這樣來提高全國人民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堅定着大家堅持長期抗戰的決心。

從武漢要守，汪逆精衛公開叛國，抗戰轉入敵我相持的第二階段，敵人不再以軍事進攻為主而易以政治進攻為主以後，抗戰建國的任務就一天更形艱險困苦起來。我們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任務，顯然不能再是前一階段的繼續，而須有進一步的開展。這一方面要堅持着抗日文化統一戰線的鞏固與擴大，大批的收集與培養為民族、為民主、為科學、為大眾而艱苦奮鬥，奮發有為的作風的文化幹部；另一方面則須進一步的發展新文化的各部門，各方面，如文學、藝術、科學、哲學等等，使之更能為抗戰建國服務，進一步的普及文化到農村中去，工廠中去，軍隊中去，大眾中去，同時，堅決反對日寇漢奸，江派，托派的堅決對國內主張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動文化作毫不容情的鬥爭。及其荒謬「理論」的奴化活動。

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新文化運動上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有系統的研究科學的革命理論，成為一般智識青年最熱切的要求，許多革命理論的經典巨著介紹進來，印行出來而獲得大意的銷行。

第二，學術中國化成了一般文化工作者的共同信念。「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一名言，成為一切部門的文化工作者座右銘；文藝創作者熱烈地討論着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社會科學家在研究着中國的實際，中國的歷史，自然科學家在研究着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戰時生產、醫藥衛生等等中的具體問題，哲學家在研究着中國古代哲學與思想上抗戰建國中的各種問題。

第三，建立了與正在發展着一個在全國新文化運動中能够起先鋒作用與模範作用的文化根據地；在那裏，大量的吸收着與培養着抗戰的文化幹部，充分的表現着自由思想、自由辯論、自由研究的生動、活潑、民主作風，大批的出版着文藝的科學的各種刊物，正確地在思想上解決着抗戰建國中的重大問題，及時地提出了新文化運動上的各種指示，大規模地進行着普及教育與消滅文盲工作。

第四，「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鮮明旗幟。抗戰建國是要驅逐日寇出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這個新中國所需要的新文化，必然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只有這樣的文化，才能為抗戰建國服務。民族的就是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壓迫，主張民族獨立與解放，提倡民族自尊自信，正確地把握住民族的實際與特點的文化。民主的，就是反對封建、反專制、反獨裁、反壓迫人民自由的思想習慣與制度，主張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與民主的作風的文化。科學的，就是反對武斷、迷信、愚昧、無知、擁護科學真理，把真理當做自己實踐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學與科學的思想，養成科學的生活與科學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眾的，就是反對擁護少數特權者，壓迫剝削大多數人



向華北敵後學習

陸 詒

整整三年的抗日戰爭，在「舉國一致團結奮發努力」這個基本條件下，居然支持到今天！不僅僅「支持」而已，從敵我戰鬥力的消長上說，我們確已從想苦奮戰的過程中，走向「愈戰愈強」，而在敵人方面，則已步上了「愈戰愈弱」的下坡路了。

這個結論從何而得來？三年來華北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實踐，足以充分的證明！
假如說「七七」抗戰的烽火，開始點燃於蘆溝橋畔，則三年後的今日，北平近郊，和蘆溝橋畔，仍然響着抗戰的槍炮聲。這便事實，即使敵寇自己，也不能加以否認。

當今年二月，記者在門頭溝附近的平西抗日游擊戰爭根據地訪問蕭克將軍時，他曾以愉快的情緒，告訴我去年七七紀念日，他們曾以兩營兵力突然進入蘆溝橋，佔據宛平城，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兩小時後，三十餘輛滿載敵軍的汽車趕來，但支抗日部隊才開始撤離該城。他們稱這次戰鬥，謂配合着全國各地紀念七七，就便也舉一個「此時此地」的武裝紀念。

今年今日，平郊的抗日部隊，是否還這樣的舉行一次武裝紀念？我此刻尚無法預知，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的，在這偉大的抗戰建國紀念日，活躍在北平近郊的民族戰士，一定會有勝利的戰鬥來振奮平津淪陷區中的同胞，鼓舞全國軍民抗戰的信心，同時，以實際的打擊，來正告敵寇：「中華民族是不可輕侮的！」

華北國土淪喪，已歷三載，時間不謂不長，但在千百萬軍民一致在華北敵後，堅持抗日游擊戰爭這個事實面前，敵人倘不能完全控制其佔領區，建立其所謂「東亞新秩序」中的「明朝華北」。

從武漢廣州淪陷之後到現在，敵寇曾不斷的在華北進行肅清治安的「掃蕩戰」，結果怎樣？損兵折將之餘，治安迄未肅正。駐守石家莊保安間的敵酋桑木師團長，在其向部屬訓話中，曾有如下的悲鳴：「明朝化華北之建設，首先非待肅清治安之安定與維持不可。而討伐實為其基幹，如果肅清之名，而不施討伐，則肅清工作，絕不能發揮其功效。故真正治安之確立，實依賴於討伐和聯合之治安工作之徹底擴充，才得以期其完整。尤以目下之「匪情」，在巧妙的組織分化之下，已獲得有大量民衆。其根柢是很深的，致使肅清之工作，形成極爲困難。……」

不管敵人今天侵華的總兵力有多少師團，但他在華北敵後這個地區，至少要擺上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強，這是因爲華北敵後軍民堅強奮戰，拖住了敵寇進攻的尾巴。要是沒有這一着，那末今天中日戰爭的棋局，將又是一種形勢了。

愚弄欺騙大多數人，使大多數人永遠陷於黑暗與痛苦的貴族特權者的文化，主張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大衆的、平民的文化，主張文化爲大衆所有，主張文化普及於大衆而又提高大衆。一句話，這種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爲內容，而有民族形式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運動還在它四個要求的個別因素上（如抗日的因素上）在全國佔統治的地位。然而，這四個要求是有機地聯繫着的。真正民族的、抗日的、必然要是民主的、科學的、大衆的。任何一種主義，一種學說，只要是對抗戰建國有所貢獻，就可成爲而且必須成爲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用任何一種主義，一種學說來包辦新文化的企圖都是有害的，沒有前途的。

正如抗戰建國有前途一樣，民主主義的文化也是有的前途的，它要在同一困難與障礙鬥爭中前進，它要在克服自己的錯誤與弱點中前進，用全中國的新文化統一戰線來爭取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

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新文化運動上還有一個軒然巨波插曲，那就是泛濫於全國各地的反汪運動。這個運動，在建立我們新中國所需要的新文化上雖沒有多大的積極的意義，但在反抗敵偽漢奸的奴化活動上却具有特殊的作用。

當汪逆精衛之流還披着漂亮的外衣躲在抗日的隊伍裏面時，他經常在把一些悲觀失望的陰影如焦土抗戰論之類的荒謬言論，散佈到對抗戰前途不甚了解的人們腦子中去、眼睛中去。同時，心惡這種不以民族利益爲第一而只固執着一己一小集團的成見與偏見如汪精衛之流的人們，也因爲他們仍然還假裝着抗戰，雖欲加以打擊而不能不有所顧慮。等

北起綏遠的大青山脈，長城內外的冀察邊境，包括冀中平原與五台山脈的齊察邊境，一直到晉東南的晉察邊境，冀南及山東平原，中條山脈，這一連串華北敵後抗日游擊戰爭根據地之形成與發展，給予華北敵寇以莫大的威脅，做了保衛大西北的屏障，同時也為將來戰略反攻打下了最富有戰略意義的前進陣地。

在這些地區內，我們現在有近×萬的正規軍，雖技術裝備尚未臻理想的條件，但他們都是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戰士，他們來自民間自動投效軍隊，確是華北民衆的子弟兵。和民衆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而且身受民族抗戰的政治教育，每個人都意識到，只有堅持抗戰，才能獲得勝利。

保證「華北始終是我們的」，不僅是近×萬精銳的抗日部隊，而且還有千百萬抗日情緒高漲的民衆，這些在抗戰中，經已自起來的民衆力量，是戰爭力量最深厚的根源。

游擊戰爭，基本上是羣衆性的武裝鬥爭。戰爭的勝敗，要看作戰軍隊在作戰各個時期中，能否得到充分的人員和物資的補充以爲斷。我們想一想在深點密佈封鎖層層的敵後方，如何能使抗戰的部隊，得到源源不絕的人力物力的補充，如何能使深入腹地的敵寇，變成「既首且豐的孤軍」，如何能使我軍的行動保持秘密，而進行突然的奇襲，如何能使敵寇的交通斷絕，彈藥給養都接不上氣，如何改變平原地形，使敵寇快速部隊亦無從「快速」，這一切離開了「動員民衆」，都是做不通的。不動員民衆，想要感勝全副武裝的日本帝國主義，這是笑話奇談！

華北敵後究竟依靠了什麼，能動員廣大的民衆力量呢？一句話，因爲那裏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

普遍的實行國父遺教——「喚起民衆」，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加強內部的團結，以抗禦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保衛祖國，這是實行民族主義。

實行村長、區長、縣長的民選，設立村區以上各級的民衆團體，廣汎的組織民衆團體，提高民衆參加抗戰的積極性與責任心，這是實行民權主義。

堅決執行國民黨所倡導的「二五減租」，取消高利貸，實行減息一分，認真優待抗戰軍人家屬，提倡合作事業，生產運動，這是實行民生主義。

單單實行一民主義，或兩民主義是不好的，必須實行真正的三民主義，才能粉碎敵寇對華北「掃蕩」——「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進攻。

抗戰進入到第四個年頭，敵寇的進攻，正愈來愈劇，——政治上的誘降逼和，挑撥離間，軍事上對正面的冒險突擊，對敵後的加緊掃蕩，經濟上的封鎖與榨取，再加上汪精衛與張精衛李精衛的跋扈逞強。僅止是抗戰到了最艱苦關頭的時期，需要我們格外奮發努力，堅持抗戰，力求進步，更加緊團結，以爭取最後勝利！看看華北敵後，敵寇雖然把這些地區，封鎖得與大後方隔離，但這些地區的軍民，仍能在極艱苦的戰鬥環境中，堅強奮戰，不斷的擊破敵人的進攻，在戰鬥過程中壯大了自身的力量。這一個明顯的事實，該足以提高我們的勝利的信心，也該足以鼓舞我們大家向進步的抗戰堡壘——華北敵後來認真學習吧！

到他們自己「圍剿而首現」而不得不卸去外衣，揭下面具了，於是各階層各部份的討汪通電就從四方八方雲片也似的飛舞起來。這批民族敗類的臨陣脫逃，不但沒有動搖我們抗戰決心的絲毫，反而使全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更加濃烈了，更加清醒了。這使過去不免有些模糊的人們，腦子輕鬆了許多，眼睛明亮了許多。忠奸之辨是從此更爲分明了；所謂「反共和平」，「和平建國」等等言詞，到底有些什麼具體內容，是從此可以了然了；不根據「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新解釋來了解中山先生自己所發展了的三民主義，即以三大政策爲中心內容的三民主義，而偏要退回去竊取從前中山先生的片言隻語來作爲三民主義的「真諦」或「正解」，將會使自已發展到什麼地步，將要遇到怎樣的命運，從此也可以瞭如指掌了。

(上接四九五頁)

就溜了出來，却也不怎樣好。試問自己到底達到什麼地步了？已經強得超過了目前「愈打愈弱」的敵人了嗎？我們所指目前敵人的各種弱點，是兵源問題，軍火問題，經濟問題，財政問題，人民生活問題，以及內政問題，外交問題等等。但我們也應當自己問問我們的團結夠了嗎？國防工業已有了些什麼成就？經濟建設的實況如何？廣大人民在生活上有没有不應有的苦痛？財政金融有些什麼不能令人滿意之處？等等。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對這些問題曾經做過些什麼努力，成效如何？其中的障礙到底是什麼？在今天，我們應當毫不虛誇，毫不掩飾的自己去批判一下。

歷史證明，三年來的國際形勢也證明，三年的抗戰更證明：敵人之強不足懼，患在自己的不夠強；敵人的中心是在自己是否「愈強」的結實，「愈強」的充分。

抗戰三週年，應當是我們根據三年中國際國內的各種事變加以一個總結的時候。



抗戰第三年的財政措施

許滌新

抗戰第三年中央政府的財政措施，不外是調整租稅、舉借新債與增發法幣三項。在這三項中，表現得最詳細的要推調整租稅。現在，就讓我們先從這方面談起吧！

首先是關稅稅率之局部更動。政府於二十八年七月二日頒佈「非常時期禁止入口物品辦法」，對於奢侈品、消耗品，或有部份需要而可覓本國產品代替，或有敵國產製，輸入時容易冒牌侵銷的貨物，一律禁止其輸入。但為使人民得以廉價獲得其生活必需品起見，在二十八年九月二日又頒佈，海關減征進口稅辦法，規定凡非常時期禁止進口物品辦法中未經禁止入口之物品，其進口稅一律照現行稅率三分之一征收。其次是轉口稅之改進。按轉口稅之設立，乃在彌補主要稅關之淪陷。但這項收入並不怎樣多，而其影響於生產建設與人民生活者至重大。為了發展後方的生產，政府乃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增訂轉口免稅品目，連同前已專案免稅貨品，新訂土貨轉口免稅品目表，定於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對於戰區中的工廠，一如經查明確由國人自行經營而須予以救濟者，亦給與免稅的待遇。理由是：「俾在戰區易與洋貨競爭」，第三是防止水陸空私運。政府對於人民的金銀飾物及鈔票等，早已明令禁止其攜帶出口，而應給外匯貨物，亦經頒佈管理辦法。但事實上，這些只顧自己私利的民族敗類，仍繼續不絕地在幹這種勾當，為了有效的防止偷漏，最近又訂定防止水陸空私運特種物品進出口辦法，規定無論任何公私機關，由商運飛機或輪船汽車載運一切物品之進出口均須受海關檢查。

鹽稅方面，計有二種措施：其一是減低鹽稅稅率；其二是改善川鄂計岸邊鹽運制度。關於前者截至最近止，減輕鹽稅稅率的地方，計有：（一）浙鹽行銷皖南淮岸旌德等縣免按每担一元或二元補稅；（二）粵區中樞北樞有配鹽均由原征每担四元九角減至三元四角；（三）粵區三亞海頭湧陸地魚鹽山原征坐配稅，每担三元四角改為附場稅二元九角；（四）粵鹽經桂行銷湘南粵岸，其經桂之原征桂省銷稅，免予征收；（五）豫區周口漢河淮稅減按每担五元一角征收；三河尖，潢川淮稅減按三元八角征收；（六）皖北鹽務暫由院財廳兼辦該區稅率，准每担併徵不得超過二元，在開辦之初，先收一元；（七）開放對粵鹽銷區撤銷對收岸稅每担三元；（八）上海租界私鹽，由原徵每担八元五角減徵為三元六角；（九）浙區吉安等四縣，由原徵八元四角；餘杭一縣由原徵七元四角一律減徵三元四角；（十）行銷陝區各種鹽斤，停止救國捐每担五角。這一種措施，雖則減低了鹽稅之收入，但從體恤民艱的意義看來，未始不是可喜之事，即於後者，政府根據五中全會的決議——鹽務制度應以民製官收，官運商銷為原則。改善川區計岸邊岸的辦法，在二十八年九月起公開投標，招商代運存於各扼要地點。此項代運商底負運鹽之責，並無售鹽之權。所有鹽斤，運至指定地點後，乃發各該地銷商，分運行銷。

作為戰前中央稅收三種大來源的關稅與鹽稅，在這一兩年來，有著這樣的措施，但在稅務方面，因為大後方的腐蝕，尚未有發展到應有的程度，所以這一年來沒有什麼積極的建樹。除此之外，做得比較詳細的，要算是直接稅之進行。直接稅制度之樹立，乃是中國財政史上的創舉。在直接稅裏，所得稅是在抗戰以前就推行的。該稅自二十六年一月一日便開始徵收。抗戰爆發之後，財部更努力推行，邊區省區如寧夏、青海、新疆、西康等地，均設有稽徵機關，在各區國稅中，已自第六位進居第三位。在廿八年度稅收總額，已超過預算數。但該稅暫行條例課稅範圍遺漏財產租賃所得稅一項，實屬憾事，去年財政部為增加戰時稅收及平均財政負擔起見，乃將財產租賃所得，列入課稅範圍。推行以來，可稱順利。其次為營業稅徵收遺產稅。遺產稅暫行條例於廿七年九月三十日由立法院通過，並經國府於廿七年十月六日明令公佈。惟施行日期尚未確定。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國民政府又頒佈遺產稅暫行條例施行細則。為了加強直接稅之徵收，政府定於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在廣東成立直接稅處。該處的工作範圍，包括所得稅、利得稅、遺產稅、和印花稅等。成立了這個負責的機關，或許直接稅之徵收將有更佳的成績的。

以上是政府在抗戰第三年度中對於租稅之一些措施。根據這項措施，與其說是為了財政的需要，毋寧說是為了調整稅制。因為在這種調整中，加稅的增益是極有限的；而不少的租稅且有將現行稅率酌予減免者。總括各項收入，每月至多只有數千萬元而已。所這種數量去供應幾萬萬元的支出，顯然是差得很遠的。為了適應當前的需要，自不能不從舉債及增發鈔票方面想辦法。

舉債可分為二類，一是中央政府所發行的內債，一是中央政府所舉借的外債。至於地方公債之發行，其目的乃在彌補各地方政府預算之不足或充地方建設事業之用的，故略而不論。以內債來說，自二十八年四月間發行了六萬萬元建設公債和六萬萬元軍需公債之後，一直到現在，仍未募集新的內債。不過便利公債之發行起見，財政部在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公佈節約建國儲蓄券條例，於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又公佈施行細則發行節約建國儲蓄券。以外債來說，據零碎的電訊所傳，這一年來的外債，約有二端：其一是二十八年秋間中蘇成立的新借款，數額為七萬五千萬元，合美金一萬五千萬元，（如以當時法幣的匯率來換算，則此項借款價值法幣十八萬萬五千元）。其次為二十九年三月間中美新成立的貸貨借款，數額為二千萬元。但在條件上，據說相當嚴酷，在歐洲爆發了帝國主義戰爭的今日，在我國抗戰已踏進相持階段的今日，蘇聯這一萬五千萬美元的借債，說明了誰才是中國民族的真正朋友，指出了抗戰中爭取外援所應走的方向是什麼了。

講到法幣的發行額，據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二十八年六月份的檢查公告，中、中、交、農四行的發行總額為二十六萬萬餘元；到了同年十二月底已增加至三十萬萬餘元。半年之間，已增加了四萬萬餘元；到了二十九年六月底，據報告已達到三十九萬六千餘萬元了，如果這一個數字去事實不遠，則法幣的增發額，是不能算怎麼多的。

過去這一年，政府就是以這種辦法去維持戰時財政之支出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過去這一年與以前兩年相同，經費的來源仍側重在借債與增發鈔票，而稅則佔着比較次要的地位。這是一般國家戰時財政的共通點，並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如果與敵人的五十餘億的鈔票和二百多億的國債比較起來，則我國財政的更能支持長期戰爭的優越性就表現得更明白了。但是，從二十八年一七七到現在這一年間，差不多有十個月已踏上了相持階段，

因此，我們的財政，顯得比以前兩年，來得較為困難。困難的地方，表現在下列各點：第一，沿海沿江大城市喪失之後敵偽據去了「江海」、「粵海」、「天津」、「青島」、「江漢」各個稅關，劫取了大部份的關稅，而同時，敵人與漢口之無恥走私，又使後方各關受到了影響，這樣就使過去佔收入之大宗的關稅縮小得很利害了。第二，一些對於抗戰無信心的民族收類，看見抗戰已進入艱苦的階段，表示得更加動搖，他們把大量的資金跑去港滬做投機事業，對於開辦後方，表示怠工。這樣就影響到稅與直接稅之收入了。抗戰的局面越艱苦，則財政上這種趨加表現得利害。第三，外債方面，因歐洲的帝國主義戰爭之擴大，英法一天處於不利的地位。就這樣，削弱了他們在遠東的國際地位，削弱了他們對遠東的能力。滇緬鐵路工程，因為英國之不履行中英貨物借款的協定而告停頓，就是一個例子。雖然英國對於中國抗戰財政之幫助十分有限，但是，它這一個例子却說明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將縮小中國對外資金活動的範圍。第四，因為戰區的日益擴大，偽幣和敵寇的軍用票已在淪陷區中奪取去法幣一部份的流通市場，所以，某一數量的鈔票之增發，容易表現了膨脹的現象，容易在物價上發生消極的影響。

這些困難是明白地存在着，而同時，在主觀方面，亦呈現了若干缺點。這些缺點是：

第一，過去一年的財政，仍未能把它的基礎建築在「有錢出錢」的原則上？建築在提高民衆的抗戰熱忱與生產熱忱的前提下。過去這一年財政當局所採取的措施，只是零碎地在一些稅制上下工夫，而未能着眼於稅原之培養。因此，一切的負擔幾乎大部份落在中下階級的身上，富強的人們，轉可利用其特殊地位，大發其國難財。這種現象如果再延長下去，則戰時財政是很難有好的成就的。

第二，關稅方面，尚未能在民衆動員的前提下，禁止漢奸及其他民族敗類之走私。現在的走私

，有一種是敵寇漢奸們幹的，他們的勾當是在把敵貨運到各地傾銷；其他尚有一種是一些民族敗類幹的，他們利用其特殊地位，專門私運國家所禁止的奢侈品入口，私運國家所禁止的金銀飾物及鈔票出口，爲了根絕這一切的走私，單單規定一些辦法是顯然不夠的，如果只把這些辦法去對付一般人民，更是無補於問題之解決。

第三，政府對於各地鹽稅之降低，其目的在「體恤戰時人民的負擔」，但事實上，一些統制鹽食的地方，總保甲長常利用其專賣的權利，任意提高價格。其結果，鹽稅雖然則減低，但減低鹽稅的利益，受之者不是廣大的人民而是那些販鹽的商賈和專賣的保甲長。在這種情形之下，以言國家收入也好，以言體恤民艱也好，都是一無是處的。

第四，非常時期過分利得稅的開徵日期，原擬自二十七年七月一日起徵，嗣以財部商局商人的請求，將該稅改由二十八年一月一日開徵，到二十八年七月六日才公佈修正條例的施行細則。這一來，限制投機壟斷的過分利得稅，便不免延擱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點！至於其他直接稅之推行，亦缺乏充分的宣傳與解釋。這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五，關於法幣之發行，不但要顧到量的多少，而且要注意到它在流通過程中所引起的作用。法幣的發行數量，或許不能說怎麼多，但在作用方面，卻是不能不使我們担心的。可不是嗎？現在的通貨大部份都集中在幾個城市，都是握在少數發國難財者手中。這種通貨偏在的狀況，本已是推動物價之上昇的；而他們之窮者極修，更又使物價扶搖直上了。談到這個地方，就使我們更明白地看出財政上的革新，是要以改革政治機構和動員民衆爲前提的。如果離棄這個前提，則一切最美麗的辭句，都不外醜惡的外衣罷了。

爲了抗戰的利益，人民應當協助政府，爲奠定這些前提而努力！



寫在前面

三年來的敵軍

英夫

抗戰三年了，由於全國軍民的英勇奮鬥，抗戰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各黨派的堅持團結、日本人民的反戰、國際友人的幫助，已使抗戰由敵人大規模戰略進攻的優勢轉入了戰略相持的相當平衡。

三年來的戰爭更進一步向全世界人民證明中國今天的問題已不是抗戰能不能勝利的問題，而是自己去不去爭取這個勝利的問題，也就是說能不能堅持抗戰的問題。

三年來的戰爭又證明中國之能不能堅持抗戰，是以能不能堅持團結力求進步為先決條件的。

「敵人愈戰愈弱」這個口號，經過了三年的抗戰，已經成了全國人民的一致信念。但又由於一些人對這一問題了解的錯誤或不夠，就出現了目前二種不正確的傾向：（一）直到今天還不相信敵人力量比以前削弱；（二）不顧事實的輕敵傾向。今天雖然第一種人減少了，然第二種人却大大的增多了，因此「敵人現在已無任何的力量了」，「敵人現在只有死路一條了」，「中國抗戰已經勝利了」，「一九四〇年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回到南京了」等類論大為流行，這是非常錯誤，極端危險的。

那麼我們有什麼根據來說這些理論是錯誤與危險的呢？單就軍事方面講，三年來的戰爭中敵軍方面究竟起了些什麼變化呢？敵人愈戰愈弱究竟弱到了什麼程度呢？敵人是會自己去死亡呢？假若不是，那他在目前又有些什麼企圖呢？針對着敵人的企圖我們在軍事上應該採取些什麼對策呢？這一大串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很好來研究與解決的，同時應該認識我們在檢討敵人不妥要我們去敘述自己的希望，而是根據敵人的實際情形去了解敵人的真像。

一、三年來敵軍的幾個重要變化

甲，三年來敵軍事勢的變化

三年來中國抗戰的堅持，都證明了敵人對中國力量估計不足，對中國歷史環境估計的錯誤，因此速戰速決已經失敗。阿部說：「一部份國人，認為解決中國事變的意義，即係建立中國新政府，推翻國民政府，及撤退日本軍隊三事。此種思想，至為錯誤，解決中國事變，並非如此簡單；國民政府現擁有軍隊二百四十師，其外尚有游擊軍一百萬以上，如何解決此類鉅額的軍隊？如何應付國內經濟問題？及如何對付第三國之態度？均為棘手之問題。因此，欲徹底解決中國事件，至少需要五年或十年之久。」這話，更清楚的承認了速戰速決戰略在中國失敗，過去速戰速決計劃的失敗，決定了今後日本不能再速戰速決的計劃。但又由於敵人滅亡中國的侵華政策不肯放棄，又決定了他不能不隨着中國的持久抗戰，來進行他的持久侵略（儘管他不願如此）而這種由速戰到持久的戰略，是敵人三年來在軍事上的第一個變化。

自從武漢會戰以後，敵人大規模的軍事進攻是停止了，但敵後大規模的掃蕩，却開始了，敵後的掃蕩，成了敵人二期作戰中的主要目標，儘管在還個時期中，敵人也曾進行了幾個比較大的戰役進攻，如襄樊的突擊，湖北的進攻，桂南、綏西、粵北，以至於今日的襄西作戰，但他們中間既沒有有機的戰略聯繫與配合，又沒有一個一定的作戰目標，不是戰略的進攻，而只是戰役的投機跳躍。這就是說：由於速戰速決戰略的失敗，使敵人在作戰的形勢上，也不能不從戰略的進攻，轉到戰略的防守。由大規模的正面進攻，轉為大規模的敵後掃蕩，及個別戰役的跳躍進攻。這是三年來敵人在軍事上的第二個變化。

基於敵人作戰形勢的變化，及作戰重點的變化（從正面到敵後），使敵人完全處於外線的姿態，就不能不因為我方的正面作戰的堅持，敵後游擊戰的廣泛發動，與敵人不放棄其正面的進攻，大規模的敵後掃蕩，以及敵人在

我軍主力決戰，與我之避用主力作正面陣地的決戰，進行機動的運動戰，而改變為既是外線的又是內線的，既是前鋒的，又是後方的大牙交錯的作戰姿態。這種由外線轉為大牙交錯的作戰姿態，又是三年來敵人在軍事上的第三個變化。

由於敵人戰略由速決到持久的轉變，又由於敵人還不放棄速戰速決的企圖，就影響到敵人在作戰目標上的變動。顯然，在第一期作戰中，敵人是企圖以奪取我某些重要城地，逼迫我軍的投降，以期達到戰略的速戰速決。然而實行的結果，中國雖然失掉了許多中心城市，但抗戰却仍然堅持着，抗戰軍隊的主力仍然存在發展着。失敗教訓了敵人，使他認識到今天，要解決中國問題已經不能以奪取某些中心城市來獲得，必須要先消滅抗戰軍隊的主力，使中國不能支持抗戰才能獲得。這一轉變在最近的幾次戰役中，都看得很清楚；如這次豫鄂邊由五月一日，到五月底的戰役中，如果說敵人的企圖是攻佔南陽新野等地，但不如說是想消滅大洪山、大巴山地區之我軍主力為妥當。但這不是說敵人為了消滅我軍的主力，就不要我們的地方了呢？恰相反，消滅我軍的最終目的正是為着奪取我們的地方。這種所謂「捕捉」辦法，不過是在敵人兵力不足與我之避免主力決戰的條件下不得不隨着我軍打圈子的戰法。這僅僅是作戰目標主動關係的轉變，而決不是作戰目的——滅亡全中國——的變化。

乙，敵軍素質的變化

我們只要研究一下日本軍隊的內部情形，便可發現幾個和過去不同的變化：

(一)由堅決到動搖、到部份的向我投降的變化，也就是說士氣由上而下的變化。當戰爭開始時，敵軍士氣的旺盛，作戰的堅決、勇敢，是誰都承認的事實；在許多戰鬥中我軍把敵人包圍起來，他們死都不撓槍，甚至於我們把他俘虜過來，替他們在傷口敷藥的時候，他們摸了槍還是要打我的戰例（如平型關及起初晉察冀邊區的幾次戰鬥）。然而經過三年來抗戰弟兄的英勇奮鬥，敵軍工作的開展，優待俘虜條例的實施及戰爭的延長，敵軍生活的日益痛苦，使武士道的宣傳一天天的趨於破產，反戰運動已在敵軍中廣泛的展開着，雖然還沒有走上自覺的，有組織的階段，但各地敵軍的轉變，與向我投降的事件，都在一些地方發展着（如塘沽南寧山西敵軍的轉變，投降過來的如晉察冀邊區的五十多俘虜，又如三五九旅內現有六個已經充當幹部

的俘虜是自己攜槍過來的等等）。也有在作戰中受我宣傳而停止射擊的（八路軍神頭村戰鬥）。這是由上而下變化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則表現在敵軍小部隊的不敢離開大部隊，這是與抗戰開始時二三個人可以離開本部到二三十里地方去搶掠姦淫的情形大異其趣的。當時敵人曾以「無攻不克」，「無敵不勝」，「無求不得」的口號，來標榜「皇軍」的所向無敵（？）。然而現在呢？許多的事實證明「皇軍」不僅是「有戰不勝」的，「有攻不克」的，「有求不得」的，更有大吃羅頭的戰績（如平型關、台兒莊、隨縣、湘北、粵北以及今天華北的掃蕩）。而且是越來越多。當然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抗戰軍民的英勇善戰，但敵軍中間的這種變化，却也是有着決定作用的。

(二)敵軍內部分化的日益發展。由於武士道麻醉宣傳在敵軍中的破產，由於統治階級在戰爭中而目的日益暴露，使上層統治階級與下層羣衆日益分化也是必然的現象。這種分化，反映在軍隊中的，如下層士兵槍殺長官及不聽命令事件的不斷發生，（如第六獨立旅，一一〇師團，一〇一師團中的槍殺事件，及一〇六師團，與山西敵的鬥爭運動，不聽調動等。）同時又由於戰爭的失利，使統治者間與部隊間的矛盾衝突事件也不斷的發生。（如桑木師團長與華北派遣軍意見的不合，華中與華北，與華南派遣軍意見的不合，以及在進攻晉察冀邊區的戰鬥中因作戰的失敗而出現獨立第X旅與X旅的衝突，以至於最後使一旅團自殺等。）敵如陸相於今年四月在師團長會議上，開天闢地第一章所說的：「鑒於現下軍隊之實狀，振作軍紀，增強團結等軍人道德，的確為緊要。」這說話，更足以說明敵軍內部的急劇分化。

(三)敵人軍事素質的日益衰落。由於敵軍兵力的不足，兵源的困難，侵華戰爭又不能減少一定程度所必需的兵力，以及戰爭中的重大傷亡，就使敵人不能不把一些只經過短期訓練，或老弱的人員（如補充兵等），調來作戰，同時又因為敵人的兵力不足，及其以華制華政策的執行，所出現的敵偽混合編制，就使得敵人不僅在政治的訓練上，大不如前。而且也使軍事素質不能與以前相比擬。過去敵人不論在戰鬥動作上，在各個部隊的聯絡配合上，在增援上，在士兵單獨作戰的能力上，在射擊的技術上，都是大家所公認為：是具有高度軍事素質的軍隊。隨着也出現了第一期作戰中，敵軍的異常頑強性。然時至今日，已非昔比矣，我們不應該也不能過低的估計敵人的戰鬥力，但不如以前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隨便舉個例來講，去年八一三以前的兩年中，十八集團軍共斃敵傷敵是八萬餘，自己的傷亡是五萬餘，造成的

此例是一。五與一之比，去年冬季攻勢中，敵傷的傷亡是一萬九千餘，自己的傷亡是七千九百餘，造成的比例是二。五與一之比，然而我們還不應該單單看對敵軍傷亡比例，由一。五到二。五倍於我的這樣巨大增加的一方面，更應該認識：在第一期抗戰中，我敵後部隊是以戰略進攻（游擊戰路）出現於敵後是乘敵之隙，是對敵人的戰略襲擊，然在去年冬季攻勢中，敵人不僅是以較第一期絕對優勢的兵力，以精密的掃蕩計劃，以進攻（防禦的進攻）的姿態，出現於敵後，更有利的是交通建設，工事構築，比第一期的飛躍發展。（在華北僅三月一日到十三日的半月中，交通的建設已超過了一萬克羅米突，僅墨之多更是不勝舉，僅白晉公路，從于洪口到號亭一段新築的據點就有一百二十三個。）如果僅按照這種情形來看，第二期作戰中，我軍的傷亡應該比第一期大，敵人的應該比第一期小，然結果却恰恰相反，敵人的傷亡是驚人的增加，我軍是愈益減少。當然這不能單單是軍事的原因，而主要是政治的、羣衆的原因，及我軍戰鬥力的日益提高。但敵人軍事素質的日益低落，也確是個不能忽視的因素。

這就是說三年來的戰爭，由於我們作戰的正義性、進步性，敵人作戰的反應性、退步性，而決定了敵人在戰爭中的愈戰愈弱，我軍的愈戰愈強。又由於我全國抗戰軍民的英勇奮鬥堅持抗戰，更促進了敵人愈戰愈弱的速度與程度。

丙、敵軍編制裝備的變化

由於戰略上的變化，由於我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軍隊與民衆配合的全國戰爭的特點，使敵軍在編制上，裝備上，不能不以這種戰爭的特點而有所改變，這種變動一般的來說可分以下幾方面：

一、在編制方面：

A 師團由四團制到三團制。固然不論敵人是向游擊戰或掃蕩戰，或向正面戰線戰。都要求他極大的靈活性，也就是說要求敵人作戰單位的縮小與輕便；當抗戰開始時，敵人調來作戰的常備師團，一般的是二萬四五千左右，後來因為戰線的延長，調動的不便，故後來的後備師團雖然仍爲二旅四團制，但人數却減少到二萬一二千人左右。後來戰爭的更加發展，敵人的兵力更加分散，就更要求敵人作戰單位的縮小，因此到了增編編師團來擊多數的敵成了三團制，取消了二旅四團制，（事實上旅在作戰上並沒決定的意義。）這種編制的縮小，在抗戰的第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底）還

沒有出現於戰場，到了第二年就佔了多數部隊總數的五分之一（六個師團），到第三年就達到了參戰總兵力的四十三分之十六了（獨立旅以半個師團計），佔年底總兵力的三十五分之十六，到今年因爲獨立旅的增加，就影響到了他的增加，在這些師團的中間，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的佔十七個師團，也就是說佔三團制師團在華作戰總數的五分之一，從這裏我們又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他的作戰要求。

B 獨立旅的大量增多。敵人根據屢次對我敵後部隊作戰失敗經驗，特別是山地作戰的失敗，使他們除了在師團編制的改組之外，又大量的建立了「山地作戰部隊」。就是說獨立旅的編成，他是以五個獨立步兵大隊（這個大隊較營大較團小）加上特種兵（特種工兵），各一大隊編成。並配以強敵之火力，人員主要的是補充兵，這樣編成的結果，一方面收輕便而有強敵之效；另一方面又可以收以補充兵代替常備兵之果。這種編制的獨立旅，現在添加作戰的已有十五個，其中晉綏境內有五個，河北境內有三個，山東有三個，蘇皖境內有三個，贛皖邊境有一個，也就是說華北佔全部五分之十一，華中佔五分之四，事實上就是五分之十一，同八路軍作戰。五分之三與新四軍作戰，五分之一與友軍作戰。很清楚的從他分佈的地區，與作戰的對象上，又可以知道他編成的企圖是便利於同我游擊部隊（敵後部隊）進行掃蕩戰。而不是其他。

二、裝備上的變化

重火器的增加。在一些師團裏，由於步兵四團變爲三團的結果，使師團內步砲隊的比例起了變化，也就是說：砲兵已經由過去的三與一之比，變爲今天的三與一之比，是相對的加強了火力，就一般部隊來說，人數是逐漸減少，但武器却仍舊，這也形成了重火器的相對增進。又如在獨立旅團裏火器顯然是比過去一個旅強得多。

重火器的集中到分散。一般的講，過去的步兵中隊（連）裏，是沒有砲兵的，現在很多步兵的中隊，已經附有砲兵，及機槍排（小隊）的增加。這是敵人對付我敵後部隊所謂「裝備良好的快速部隊」，同時由於這種編制的結果就影響到一部份特種兵的由集中到分散。

瓦斯的普遍配屬。華北的敵軍，一般的每人二個瓦斯筒，這是準備與我作戰在急襲時使用的。特別是我包圍或快要解決戰鬥的時候，（如何開，大龍華，兼派等許多激烈的戰鬥中。）敵會桑木師團長公開的告訴部屬：「

在與敵國（即我抗戰部隊）作戰緊急的時候，且莫忘記使用你的瓦斯。在正面作戰的部隊裏，雖不是如此普遍的配屬，但聯隊裏却組織有瓦斯中隊。來回調動配屬於作戰部隊，這是過去所沒有的現象，同時根據去年十一月敵太原兵工廠一批收買馬前子二萬斤來遠製瓦斯及大量收買辣椒的情形看來，今後這種武器在部隊中的應用更會加強起來。

儘管敵人極力要求自己火器的加強，雖然有些比以前加強了，但戰爭中消耗的巨大，補充的困難，使敵人在許多部隊中現有的武裝，已大大的減弱了。例如敵軍主力之×師團，當抗戰初起時，一個步兵中隊（連），有機槍八挺，到了現在却減少成了四挺，或五挺，也就

是說比抗戰初減少了一倍。又如抗戰初起時敵人奪獲我軍的步槍，一般的是燒掉（如在太原、臨汾、晉西南、上海等戰鬥中等），也到了現在不要說我軍的完整武器，他不會燒，就是已經損壞了的，他也要再修理一下拿來用。（如山西作戰的敵軍，很多是用過去山西造的六五步槍。

）其他的也莫不如此，單就日本自己造的武器來講，在製造上，在原料上，也較以前大為遜色了。（如翻砂的砲彈修補的破槍等。）

這是說明了敵軍裝備上，向上向下發展的兩個方面，同時根據今年敵軍發表的軍備擴充預算的巨大數目看來，敵軍確有增強部隊裝備的企圖，與趨勢是值得注意的。

二、敵軍困難的面面觀

陷於三年戰爭中的敵人，已經是泥足日深，困難的情形，在與日俱增中，這差不多成了國人的一般信念。那麼，敵人究竟困難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呢？我們究竟怎樣去認識敵人這些困難呢？

第一、兵員補充上的困難。根據過去的統計，敵國軍近二十餘年來，（因為敵人兵役法的不同，在二十五年之中是補充、後備、預備及現役兵是可能隨時征調入伍的。）每年招募入伍的新兵，大正八年（民七年）到十年（民九年）三年間，每年是一五四、〇〇〇人，大正十一年因為縮編的緣故減



到一二五、〇〇〇人，大正十二、十三兩年間，二次軍備擴張，每年減少到一二〇、〇〇〇人，大正十四年，至昭和六年（民十三年到十九年）的七年間，因二次軍備縮編縮編為十七個師，故每年人數為一一五、〇〇〇人，昭和七年因九一八事變而擴充到一三九、〇〇〇人，昭和八年又增到一五〇、〇〇〇人，昭和九年為一五八、〇〇〇人，昭和十年為一六五、〇〇〇人，昭和十一年至十三年三年間每年為一九〇、〇〇〇，總計在七七事變以前，經過訓練的能夠應召入伍者，為二、八一〇、〇〇〇人，然根據第一次歐戰的經驗，每年的死亡率為百分之二，調動率為百分之二，依此來計算，在此二十年內，死亡與調動不能入伍之總數，為八四八、四二〇人，故實額應為一、九六五、五八〇人。當當事變發生後，敵即延長兵役年齡至四十五歲（延長五年），當可增加七十五萬，（按後備役每年人數為十五萬計算）此外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二年中，敵人最少召集入伍之新兵為三十八萬。（按一九三七年一九〇、〇〇〇人計算）故總數應為一、九六五、五八〇人，加上七五〇、〇〇〇，再加上三八〇、〇〇〇之總數和一、二〇九五、五八〇人。

三年來，戰爭中敵人的傷亡總數，根據比較確實的統計材料，應為一百三十餘萬到一百四十萬人。即

廿六年七七至二十七年年底 傷亡數為 七〇一、〇九〇，
廿八年一月至年底 四〇九、七九五，

廿九年一月至目前（按每月四萬統計） 二四〇、〇〇〇，
根據敵人所發表的百分之四十的死傷，百分之六十的病廢，及死傷內百分之二十的死亡，百分之八十傷病，計算其中當有四十五萬人能置上前線！或担负一定的後方勤務，故敵死傷（即死亡與不能担负一定勤務者）之總數，應為九十五萬之多。

目前敵軍在華兵力約為八十萬至八十五萬，在滿州者約為二十萬，在朝鮮、台灣、日本國內者約十五萬（只計正規師團），據一般的來看，敵人一

備師團需要一萬人作他經常補充之數，故目前敵國內，充當此項任務，不能編為其他番號者，當為五十五萬之譜，故目前敵人可以動員入伍，編為新番號，當為：三、〇九五、五八〇人，減去在華作戰之八十萬到八十五萬，在東北之二十萬，在日本朝鮮台灣之十五萬，在華死傷之九十五萬，不能編為其他番號之五十五萬，再減去已參加海軍之九萬，空軍之二萬，共三三〇、〇〇〇人到三三〇、〇〇〇人。也就是說可以再編十一個師團，到十三個師團。

這裏應該說明的是：敵人作戰部隊的組成，不是單純的常備兵，而是包含常備、預備、後備、補充及國民第一補充兵，幾種不同的兵役，因此敵人過去入伍者，或參加作戰中不能單算在常備兵役之列。故常備兵尚餘之數應比上面計算者為多。又因敵人現採用之偽混合編制法，敵在華、朝之中又不完全為日人，因此敵尚可動員入伍之數當超過三三〇、〇〇〇到三三〇、〇〇〇之上。

根據這種計算，我們在敵人兵員的補充上，究竟得出什麼結論呢？

(一)敵人在三年來的戰爭中，人員的困難已到了死亡的頂點，雖然敵國內尚有數十萬人，可以招募入伍，但在國內維持治安，及準備鎮壓國內革命運動上，又不能不留下一定數量，同時，又由於國際間的尖銳矛盾，及日寇對國際上的冒險計劃，已經使日寇很困難一下子動員二十萬，或三十萬，到中國來作戰，這是敵人的極大痛苦，是我們的偉大勝利。

(二)由於敵人還可以有一部分人員，在必要時調來作戰，由於敵人現在大量組織訓練偽軍，進行偽混合編制的「以華制華」政策，因此我們在今天還不能說：敵人現在已經是無能力爲了，已經不能有任何的補充了，應該注意假使我們在今天不能更大的消耗敵人，不去有效的粉碎敵人以華制華的陰謀，不去積極的準備抗戰力量的話，就在人員的問題上，敵人在一定的時候，也有進行戰略再進攻的可能。這種危險是存在的。

第二、是敵軍經濟上的困難。在這裏先說彈藥。軍隊沒有彈藥，就不能進行現代的戰爭，戰爭的發展不僅使人的消耗增大，而且更使物資的消耗增大，特別是彈藥，也正因這種物資消耗的增大，才使作戰中的人的消耗增多。三年來的中日戰爭，已經使這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陷於啼笑皆非的境地，單就彈藥上來講：據敵砲兵少佐吉水義算的估計：「今日之步兵除除所有火器，同時射擊一分間須打出十五噸之鐵量。即敵戰（第一次敵戰

）初期的四倍，後期的二倍，惟非連續射擊，十分間一聯隊爲九噸，這是補充的基礎。這僅係步兵消耗的彈藥，至於砲兵，更爲其大之消耗，這是不待說的。」根據這種推算，據大公報的統計，僅上海一個會戰，敵人共消費一百〇六萬餘噸，共值約二十一億元以上，三年來消耗的龐大，更可以想像了。因此就餘能以過去的軍火儲蓄來補救這三年中一百八十億軍費的不足。板垣去年三月三日在衆議員會議上說：「(一)從略(二)十三年度預算比較實需尚屬不足，因此非常痛苦。(三)從來儲存的軍火已相當的消耗。」從這裏也可以得到證明。補充的困難又使敵人不能不在前報上來作最大的節省，如陸相在今年四月師團長會議上說：「雖爲一分一釐亦應念其爲國民辛苦之結晶，在物資經費的使用上，無論其小至如何程度，都決不能怠慢疏忽而陷於混亂。」桑本師團長在二〇師團長會議上講：「鑑於事變之持久性，故此後我軍須自愛，節約軍需資源。」在辯護敵人的許多文件中也可以看到讓前方士兵，節約彈藥的命令，然而這種節約，並不能挽救前方彈藥的缺乏，舉個例來講：在上海戰役，敵人的砲兵射擊，一天是沒有定額的彈藥，然到南昌會戰時，野砲每天却只有二百發砲彈，吋榴砲一天只有一百二十枚，山砲每天一百五十枚，野戰軍砲每天是一百枚，而這些砲彈的補充，又有很多是從太原、天津、濟南等地敵軍中抽來的，再看現在敵後作戰和過去一個顯著不同的特點，便是殺傷多，而繳獲少。如十八集團軍在抗戰兩周年以前的二年的戰爭中，斃傷敵人是八萬餘，繳獲的步馬槍二萬餘枝佔人數的四分之一。而在冬季攻勢中斃傷敵人是九萬九千餘，而繳獲的步槍是二千一百餘枝，佔人數的九分之一，便是敵人武裝彈藥困難的最好說明。

其次是軍餉的困難。過去敵軍除了正常軍餉一定按時或提前發給外，每當前線有大小勝利或節日之時，定可得大批的獎金，或發給雙份軍餉，然而到了現在，不僅額外的獎金及雙份的軍餉得不到，就是正常的軍餉，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得到，據所知道的如：前在河南之十四師團，有二個月不發軍餉，致產生偷竊軍糧出賣的事件。晉東南之敵也已經有四個月不發軍餉了。

再其次爲給養上的困難，誰都知道，戰爭開始時「皇軍」的給養是：大米罐頭，(就是很小的部隊也是一樣)，每禮拜還另發酒七瓶香烟十四盒，在獲得我軍之小米時，不是分給民衆作食糧，就是燒掉，但現在不僅烟酒減少到了極少程度，大米罐頭經常吃不到，就是小米有時也吃不到，其次在服裝上，戰爭開始時，威風凜凜的「皇軍」，每人都可以有實呢子衣服，長通子

皮鞋，然現在不值黃呢子的衣服士兵得不對，就是布的大衣也要三年以上的老兵，及幹部才有資格得到。皮鞋子在「聖戰」中也不能不變成了布鞋子。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敵人的軍紀，更是一敗塗地，儘管敵人的槍劫禁令一道跟着道，從上級傳到下层，但皇軍的軍紀却是日益蕩然，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着。

第三、是反戰運動的高漲。日本對華戰爭的退步性，不僅造成了與中國人民的對立也更高度的激起了國內階級的對立，這也是日本人民反戰的必然性。戰爭的無限延長，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所加諸人民生活的痛苦，以及我們優待俘虜政策的實施，又更促成了反戰運動的高漲發展，根據一年來一些不完全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種情形：

A 一年來敵軍大規模轉變者有大沽、江陰、無錫三次，參加人數在四、五千人以上。

B 一年來敵軍較大之暴動有廣州、漢口兩次，參加人數在八千人以上。

C 一年來敵軍內部衝突者，有富池、廣州兩次，參加人數在二千人以上（廣州的因無統計數字故略）。

D 去年十一月台軍一部，與日本衝突，斃日軍二百餘，後潛入山中向敵實行游擊。

E 一年間據槍向我投誠者約五百餘（廣東、山西）。

上面的情形已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敵軍中的反戰運動，已經從消極的自殺厭戰，走上了比較積極的轉變、暴動，已至於向我投誠，但是直到現在，這種反戰運動，還沒有走上有組織有計劃的道路，還沒有與我抗戰部隊的作戰，很好的配合起來。我方還有很多部隊，不知道敵軍反戰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還不相信爭取敵軍反戰配合我軍行動，以及爭取敵軍到我們方面來的可能性，與現實性。這是需要今後努力克服的。然而不管如何，敵軍的反戰，將隨着侵華戰爭的延長與失利，而日益擴大與發展。他將在一定的條件下，制敵人的死亡，取得最後的勝利。儘管日本軍閥法西斯，在用各種方法（包括柔道與種種的偽裝）設立各種機關（包括敵國內的「後方對策委員會」左華的「戰地郵便局」以及敵軍中之特務部等組織），都不能制止這種運動的發展，更不能消滅這個運動。

單就敵人本身來講，他的困難是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嚴重了，已經困難到不能單用現有的人力、物力、在目前來進行戰略的進攻。可是他還能

再從國內征調一部來進行幾個戰役的進攻，他的財力還可以維持到相當長的時候，敵人的困難及反戰運動，還沒有達到使敵人可見崩潰的地步，敵人的武斷宣傳，及反動統治，還沒有達到完全失效的時候。這可以起他相當大的作用。國內的人民及前線的士兵還沒有達到能夠掀起一個巨大革命運動的覺悟程度。因此，我們就不能來替敵人作過低的估計，說敵人已經沒有力量了，說敵人不足憂了。

三、相持階段中敵人的軍事企圖

在目前國際形勢急劇變化的形勢下，敵人是更急於解決中國問題，以期擴大其對國際的冒險行動，其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却仍不外以政治進攻為主，以軍事進攻為副的誘降逼降政策，但這不是說敵人目前已放棄了軍事進攻呢？顯然是不是的，雖然軍事進攻在目前是居於次要的地位，但敵人現在却正在準備着一個新的戰略再進攻。這是敵人在相持階段中軍事上的企圖，那麼我們有什麼根據來說敵人在現在有這個企圖呢？有的。

第一、是以華制華陰謀的新發展。在這方面，首先看到的大量訓練偽軍，及敵偽混合編制企圖的新發展。關於編制偽軍的問題，過去個人會這樣的分析過：「在戰略轉到相持的形勢下，敵人對偽軍的使用，將要與過去起著不同的變化，即是說過去敵人是執行着親自出馬打頭陣，讓偽軍擔任運輸、補給的任務。今後將要讓偽軍，真正成爲日軍的替死鬼，來與抗戰力量消耗，自己則逐漸轉到坐陣觀火的地位，以減少自己的犧牲，挽救自己人力物力的恐慌，實現其以華制華的陰謀。在這一陰謀下無疑的是大規模的訓練偽軍。」（關於偽軍問題羣衆第四卷第九期）根據這一分析，我們來看一看今天的情形，便可以知道敵人在是怎樣的訓練着偽軍。（下略六段）

從這些問題上，我們究竟應該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第一、敵人之出此「着」，是在人員非常困難的情形下，不得已的措置，這些訓練出來的偽軍，也不能完全等於敵軍，我們不應該把他估計得太高。第二、大量的訓練偽軍，雖然最終必然更速的促成敵人的死亡。但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條件下，無疑的是增加了敵人的力量，減少了敵人的困難與危機。增加了抗戰的困難，削弱了我們的力量。因此在今天，我們要了解敵人，就不能也不應該把敵人的孤一企圖丟開不顧，把敵人孤立起來看。第三、從敵人大量訓練偽軍的情形上來看，也證明了對敵過低估計說：敵人已無任何力量，維持我們對他

死刑理論的錯誤。更證明了一些可以在我之堅決海底的打擊，日本及國際革命力量的發展的壓迫下，敵人會必然走上死亡道路理論的錯誤。

其次是瓦解我軍，與促成我軍投降的新發展。本來瓦解敵軍，促成敵軍的投降，是戰爭中的一個組成部份，是兵家常事，敵人來進行這一工作不是開始於今天，也不是什麼奇事。但問題是我方在這一問題上，究竟起了些什麼反映，我想來檢討這一問題，對今後對策的決定上不是無益的。

敵人瓦解我軍的方法：第一、挑撥離間造成中傷的分化政策。(略)第二、用軍事上的威脅，要求得我軍的投降。第三、利祿收買。第四、經過漢奸關係，打進我軍內部進行工作。第五、與我某些部隊，實行暗中聯繫，訂立所謂「互不侵犯的協約」。(?)當然，其他的還有許多，這裏我們不必詳細來講他。

由於我軍素質的不同，歷史的不同，部隊直屬關係不同，故在對敵人這一政策也採取了三種不同的立場：

(下略四段)

第二、以戰事的新發展。由於戰爭的無法結束，敵國力消耗的慘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敵人會決定：「自今年起，對華軍事上的物資停止由國內供給，專賴在淪陷區內，就地征發。在華北方面以華北開發公司承當，華中以華中會社承當。」為了使這二個會社能完成任務，除了在他們獲得在中國被佔領區內之合法地位，獲得中國方面之投資外，敵人的投資在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對華北會社是三千萬元，十四年(一九三九)達到了二億二千六百萬元。對華中會社的投資為三千八百萬元。(數字是根據敵人所公佈的)各該會社下設鐵道、煤、鹽、電報、電話等部，計華北會社下有子公司十六所，華中會社下有十二所，分工掠奪，這裏我們略舉幾個於軍事有關的數字，來看一看敵人究竟怎樣在進行着他的以戰養戰計劃：

A 交通建設。在淪陷區內，除了把過去修的水陸交通修復外，並增添了大量的新路線，根據敵人公佈的數字，僅在華北地區，由華北公社經營之汽車路線，鐵道，及水運，在三月一日至十三日的半個月中間，竟增加了一萬二千六百六十六條。為進一步研究起見，不妨再分別來看一看實際的情形：

1. 公路 據華北方面，敵人所增築的公路幹線晉北及察察冀方面有十九條。冀中十二條。冀南十條。冀魯邊十九條。魯西南有十條。其他支線更是多不勝舉。

2. 鐵路 新築與正築者有白魯鐵路，滄石鐵路，邯鄲至大名鐵路，新汴路，濟南至開封，新綏至河津路，大同至塘沽路。(該路長四四八公里，計劃四年完成，建築費為一億九千萬日元)修復者有關海東段，津浦，平漢路，改軌者有同蒲，正太路。(改軌可以與外省鐵路互通車輛。)據華北運輸公司的報告，華北交通情形，一九三七年即開始時為甚數，去年中國各路機車行駛之指數，已增至二百五十五。客車行駛指數增至一百七十四。貨車行駛指數增至一百九十七。各路的收入去年是六千八百萬日元。預計至今年可達一萬八千五百萬日元。明年可達二萬三千萬日元。一九四二年則可達二萬八千萬元。

3. 航運 已疏浚者有大清河，捷瑞河，開鑿者有獨流鎮運河，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華北臨時政府建設總處次長三浦七郎發表之談話中稱：「華北河川五年計劃，總經費為二億五千萬日元。決定明年(即今年)動工，包括河澗有永定河、白河、大清河、子牙河、南運河」等，又可以看出敵人對水運的注意。

敵人大量增修水陸交通的結果，使華北的地形，完全改了舊觀，形成了綿密的交通網。這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作用，而還有政治上進行統治，經濟上便利於掠奪資源及大量傾銷仇貨的作用。根據今年四月廿三日大公報的統計，在察、綏、晉、陝、寧各省銷售年約二千萬元的仇貨，是經過平綏路，及其他公路，與黃河輸入的。在豫、晉、陝、甘各地銷售年約二千六百萬元的仇貨，是經過隴海路輸入的。在華南各地銷售的仇貨，是經過廣州、廣州灣、潮汕、廈門各地交通線輸入的。在山西、冀中、冀北銷售的仇貨，是經平漢北段，及同蒲、正太路輸入的。在蘇、浙、魯、皖、湘、贛各地銷售的仇貨，是經海東段，京滬路，滬杭路，及長江輸入的。然而這還不過大概情形而已，這說明了敵人在經濟上對交通的依賴性。

B 軍需工業的建設。要解決軍隊的槍砲彈藥問題，就需要有製造這些東西的工業，根據一些零星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幾方面：

甲、在華兵工廠最大者有東北瀋陽兵工廠，華北太原兵工廠，濟南兵工廠與廣州兵工廠。(下略五段)

乙、鋼鐵工廠。關於這方面的材料不多，鞍山工廠為全部改新者，其熔鐵之生產量出一九一八年之卅萬噸，增至一九三九年之一百萬噸，按此計劃至一九四二年當增至三百零六萬噸。僅日方之投資就有六萬萬日元左右，其

規模之大更可以想見了。(載蘇聯世界政治與經濟一書)

丙、煤礦工業。現在我們不要來講新設的，單就敵人搶去我們的煤礦公司較大的，就有七四家之多，其生產量約一二、四一三、六四八噸(載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根據敵人東北運輸公司的報告，在去年由大同輸出之煤已達二千六百萬噸之巨。其他地方也可以想見了。

○農產品的掠奪。

甲、棉花。敵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強迫民衆大量種植棉花；並大量廉價收買，其目的不外一、爲解決其軍火，紡織工業原料問題。並實行對中國農村的統治。二、減少糧食種植，增加淪陷區人民對其依賴性。並使我以後部隊給養問題，無法解決以達其「封殺」政策。

乙、糧食。敵人在淪陷區內，用毫無信用之偽幣，來大量收買糧食。其一部爲解決在華部隊之給養；一部輸送國內補救其國內之生活恐慌。去年冬，僅江南淪陷區，敵人就搜括食米達四百餘萬石輸送國內。其他的更可以想見了。

丙、各地敵人強派軍糧，強索田租，及各種稅收者日益增多。如江甯區每畝四斗五升之田租，每担作價十四元。在華北一些地方每畝田租五元到七元等。又如，各地設立烟稅、鹽稅、人口丁稅、所得稅、房租等等稅關。

D軍費的就地解決。這是根據敵軍軍需物資，停止由國內供給的決定而加諸實施的，雖然今天還沒有充分的材料來證明敵人這一政策實施的普遍性，但的確是在一些地方開始了。如去年敵駐滬蘇區司令官對記者稱：「以揚子江下游爲中心，在政治上，軍事上，之重要實乃中國(魯)建設之中樞。其治安之確立，乃當前之急務。」等。但進行治安之掃蕩費用，却要人民負擔。於是去年十月裏所召開宣、武、澄、虞、吳、五縣縣長以上會議，分配各縣每區分担十萬至十八萬元之軍費。並供給冬防費，及冬季服裝費等。又如在湖北，在華北等也在進行等。

我想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祇要一看敵桑木師團長在二一〇師團兵團以上幹部會議上的報告便明白了，他說：「鑑於事變之持久性，故此後我軍須善自愛，節敵軍需物資，并須努力於佔領地區內各種重要資源之開發與利用。以達成長期之進行，此不僅爲刻下之急務，且爲與「敵後」之國民齊步前進。是以軍隊不止僅爲在治安上剿滅匪團之根據地而滿足，并爲開發利用此種重要資源須得佔必妥之地點加以確保以圖現地資源之直接利用，同時

並勉行虛獲資材之蒐集利用之所極，力圖從內地之道途補給，實實現自給自足之主旨。」

那麼對敵人這一設施應作何種看法呢？他對長期抗戰有沒有影響呢？我想：(一)根據敵人在東北經營的失敗情形看來，敵人在國內的以戰養戰想達到在華作戰自給自足的計劃，也不能成功，最少目前是因難。原因是今天的敵後，已決非過去之東北可比，他不僅有廣大的游擊戰爭的開展，更有經過鍛鍊，有高度民族覺悟，及有正確領導之廣大民衆。(二)敵人以戰養戰的企圖，雖然很難全部成功，但也不能說他就不能得到部份的成績。雖沒有辦法解除他整個的經濟危機。但是可以減少敵人經濟危機的程度。我們不能對他漠不關心。(三)敵人以戰養戰的失敗，是以我之積極破壞爲先決條件的。因此，敵人以戰養戰成功或失敗的程度，是以我之破壞及爭取爲抗戰力量的程度以爲定的。

第三、敵後掃蕩與正面的戰役進攻，在軍事上是戰路再進攻的準備。敵後的掃蕩，是敵人確保佔領區的必然步驟，是造成戰路再進攻根據地的準備。而正面的戰役進攻，除了配合政治上的進攻外，又是造成戰路再進攻的有利條件，都是戰路再進攻的準備步驟。因此準備戰路的再進攻是相持階段中敵人軍事上的新企圖，但應該說明的是，這種戰路再進攻的準備，在相持階段中是政治進攻的配合，是副導的，不是主導的。(詳細的以後再談)

四、三年來敵情的基本認識

戰爭一天天的發展，敵情一天天的變化，我們所知道的這還趕不上抗戰的要求，但這不是說戰爭的發展，敵情的急劇變化，就是沒有原則的呢？不是的，他有着變化的規律，那麼在這三年來的敵情變化中究竟反映出了一些什麼東西呢？

第一、鐵一般的事實，證明了不管敵人是怎樣失敗，國際情勢是如何變化，也不管敵人的方法是如何改變，但他滅亡中國的侵華政策，是決不會改變的。近百年的歷史，三年來的戰爭以及今日敵後的慘酷掃蕩，正面的戰役進攻，經濟上的以戰養戰，政治上的以華制華，以及敵國內的一切內政設施，外交活動，都足以證明這一論據的絕對正確。不必多舉，單就敵入南進政策的問題來看，很多人以爲敵人的南進政策的執行是放棄了他的大陸政策。

是以海洋政策代替大陸政策的開始。是日本侵華政策的轉變。是他在中國三年抗戰形勢下「適可而止」的步驟。然而事實是怎樣呢？那就必須看情報部長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說：「帝國政府之維持荷印現狀，係為貫徹其變之有效之歸結。」「日本之不加入方針，係要求防止大城波及東亞，故不加入主義，並非單純的無目的之消極主義，而應視為努力處理中國事變，實現「聖戰」目的之不可缺少的條件。」但是不是說敵人要貫徹他的亡華政策，就不會去進行國際的冒險行動實行南進政策呢？不是的！事實上今天敵人已經提出了「要解決中國問題，必先爭取華僑，爭取華僑必先奪取英、法、荷，在遠東的殖民地。」的口號，已經集中了他的一部海陸空軍在南海一帶準備發動了。然而這些都祇是他亡華政策方法上的轉變，而不是亡華政策的轉變，另一方面。是不是說敵人要貫徹他的亡華政策，就可以否認敵人有向我暫時妥協的企圖呢？那也不是，但個也祇是實現亡華政策方法上的不同，而不是其他。因此祇要是不看事實的瞎子，或別有用心的人，都不會去設想敵人的亡華政策是可以「知難而退」，或「適可而止」的。

第二、三年來的戰爭，由於我全國抗戰軍民的英勇奮鬥，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及國際革命力量的幫助，已使這個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困難，快達到了死亡的頂點。但還沒有到死亡崩潰的程度。他還正從各方面去進行最後的掙扎，今天的事實告訴我們：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不能說敵人已經沒有任何力量了，更不能離開中國的堅決抗戰，日本人民的反戰運動，及世界革命力量幫助的前提，來妄稱敵人祇有死路一條了。這種輕敵的行為是極端錯誤與危險的，這就是說由於敵人的拚命掙扎，我左抗戰的進步不夠，與某些地方不進步的結果，敵人將來軍事上戰略再進攻的危險還仍然存在着，亡國的危險在今天還沒有消滅。

第三、三年來的中國抗戰，證明敵人的困難是以我國的堅決抗戰為先決條件的，將來的死亡也必然還有待於中國抗戰的堅持與發展。因此敵人失敗的程度與速度是以我抗戰的堅持，國內的團結程度，進步的速度而定的，中國的前途是勝利還是失敗主要的不是決定於敵人而是決定於中國的抗戰。

五、目前我們的軍事任務

我們僅僅是研究了過去的，認識了現在的，而束手無策是不對的，祇有正確的把握抗戰勝利的路線，才能克服時局的危險，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的

勝利。

配合着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準備反攻的總任務，我們在軍事上的鬥爭任務應該是：

一、粉碎敵後的掃蕩更廣泛的開展游擊戰爭，堅持敵後抗戰。打退敵人對正面的任何戰役進攻，實行有利的機動的戰役反攻。配合全國戰勝敵人的政治進攻。

為達此目的，必須確定目前鬥爭的二個原則：

A 敵後重於正面，沒有敵後游擊戰爭的堅持與發展，就困難有正面的相持，沒有戰略的相持，就不會出現戰略的反攻，而將來敵人不能再舉行戰略的進攻，主要的就要看我們敵後抗戰之能不能堅持發展，與粉碎敵人掃蕩、掠奪、開發、統治敵後的計劃以爲定。要完成敵後的這一戰略任務！就必須要敵後的抗戰部隊，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與軍事素養。也就是說：需要與民衆建立密切的關係，需要民衆的激進動員，需要能配合軍隊作戰適合抗戰要求能同敵人進行鬥爭的進步政權，需要正確的戰略戰術，需要正面軍隊的很好配合，需要後方民衆與當局在人力物力上的大量幫助。

B 破壞重於作戰。鞏固發展敵後，以破壞敵人在淪陷區的統治爲條件。而破壞敵人在敵後的統治，又以破壞敵人的交通建設爲先決條件。敵後作戰的勝利，有決於破壞敵人的交通的勝利。而破壞交通的勝利，又由於敵後作戰軍隊的配合。這是破壞與作戰在敵後的正確關係。這是由於敵人的交通技術條件的發達，我之交通技術條件的貧困，而產生交通要道在敵後對敵我雙方二種不同的利害關係。由於敵人力量的不足，與其軍隊裝備技術發達的特點，就產生了敵人在作戰上對交通線的依賴性。（包括敵後的掃蕩，與正面的跳躍。）又由於敵人在經濟上的以戰養戰的資源掠奪，與仇貨傾銷，又產生了他在經濟上對交通線的依賴性。同時由於我軍裝備技術的落後，由於我軍粉碎敵人的掃蕩，阻止敵人的跳躍，破壞敵人的以戰養戰，也就是說要破壞敵人在敵後的統治，建立我們的統治，就產生了我對交通線破壞的重要性質與迫切性。這就是目前敵我交通戰之所以成爲敵後鬥爭主要形勢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們提出破壞重於作戰的根據。

二、準備力量實行戰略反攻。整個將來準備力量，實行戰略反攻是以堅持抗戰，加緊團結，力求進步爲前提的，在軍事領域來講，是以激進動員民衆，發動全面全民戰爭。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爲前提的，分別來說：

甲、澈底動員民衆發動全面全民戰爭在目前的最嚴重意義。民衆在三年抗戰中，所提供的偉大力量，完全證明了不動員民衆，就不能支持長期抗戰理論的正確。過去廣大民衆的參加戰爭，才使抗戰獲得今天的勝利。然又因爲民衆動員範圍的不夠廣泛，與數量的不足，（略）又使抗戰遭受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是很可惜的。相持階段中抗戰正遭遇着日益嚴重的新困難，而這些困難又祇有澈底動員民衆才能克服，那麼爲什麼民衆的澈底動員才能克服抗戰的困難呢？怎樣才能動員民衆呢？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來很好了解的，簡單的說來，動員民衆與抗戰形勢的密切關係是：

（一）廣大民衆的動員，以堅持抗戰爲前提。但也祇有廣大民衆的澈底動員，才能用廣大民衆的力量，去保證抗戰到底的實現。（略）才能鞏固與發展團結，才能克服分裂的危險。

（二）廣大民衆的動員，以政治上的進步，給民衆以民主自由爲先決條件。但也祇有民衆的澈底動員，給民衆以參戰參政的權利才能有效的促進與保障政治的進步，民主政治的實現。

（三）廣大民衆的澈底動員，需要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與抗戰教育的提高。但也祇有廣大民衆的澈底動員，才能發揚民衆對抗戰的積極性才能動員廣大民衆的高漲，克服抗戰在經濟上的困難。與人力的困難。才能把抗戰的國防教育發揚到最高度。

整個的講來，沒有廣大民衆的澈底動員，就做不到「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男、女、老、幼」的全面全民戰；不僅抗戰的堅持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團結得不到很好的鞏固與發展，進步不能推動，敵人在目前的政治進攻打不退，就是經濟的軍事進攻也不能有效的粉碎。廣大民衆的動員是革命戰爭的特點，也是革命戰爭之所以能够勝利的根據。

乙、提高部隊的戰鬥力。相持階段中敵人政治進攻的加強，抗戰困難的增多，就必然會影響到抗戰軍隊的鞏固與發展，如像影響整個抗戰一樣。又因爲抗戰軍隊的任務，不僅僅是要能支持現在的局面，而主要的還是爭取明天的勝利。因此鞏固部隊提高部隊戰鬥力問題，就成了準備反攻的主要任務之一。而要鞏固部隊提高戰鬥力就必須做到以下三點：

（一）建立與健全軍隊的政治工作。這是鞏固部隊發展部隊唯一正確的方向。特別是相持階段的今天：（A）敵人對我軍分化、瓦解、誘降的加緊。

（B）抗戰困難的增多。（物質的困難與抗戰時間的延長）（C）軍隊對人民依賴性的空前加多。（D）與友軍密切協同在作戰上的迫切要求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沒有抗戰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可能的。但要建立與健全政治工作就必須反對那種反對並害怕政治工作，和把政治工作當作政治警察的工作。（略）這決不是革命的政治工作，而是反動的政治分化，我們要求的工作是加強部隊的政治教育，提高部隊的政治覺悟，保障部隊的團結，與各友軍的協同，保證軍民合作，保障抗戰到底，與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建立的結果，部隊間人與人的關係，不是單純的指揮，或同事關係，而同時又是同志的關係。所應去掉的是：任意打罵的奴役制度，與荒淫無度的腐敗現象。所應增加的是相親相愛的革命團結，與相互尊敬，相互勉勵，相互進步，爲革命鬥爭，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煥發精神。

（二）提高部隊的軍事素質。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第一、在部隊中進行廣泛的戰略戰術及使用新技術的軍事教育。第二、擴大與接濟抗戰有功部隊，並依其特長進行各種專門的訓練，以備將來在反攻中擔任一定的榮譽任務。（略）第三、在戰鬥中提高自己的戰鬥力，要能在失敗中求勝利，在小勝利的基礎上，求得大的勝利。

（三）嚴格正確的實行兵役法，斷然改除過去不經過政治動員的現象，爲此又必須：第一、實行廣泛澈底的羣衆動員，給羣衆以參加抗戰的自由。第二、改善過去部隊中的不良制度，建立革命部隊的正確關係。

更正：

本卷第十期上，「新的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的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文署名毛澤東同志著，實是邊區文協代表大會宣言之誤。特此更正。



論第一次中日戰爭

楊松

在目前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我們來研究四十五年前的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六月至一八九五年四月），不僅有很大的歷史意義，並且，具有實際的意義。現在且分爲以下五個問題：（一）戰前中日經濟政治狀況與兩國的外交關係。（二）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性質問題。（三）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發展過程。（四）第一次中日戰爭的影響。（五）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我國失敗的原因及其對於目前我國民族抗戰的教訓。

一 戰前中日經濟政治狀況與兩國的外交關係

（一）戰前日本的經濟政治狀況

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是一個農村的封建國家。直到明治維新的前夜，日本政府的財政收入百分之八十五是從農村經濟中得來的，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從手工業和商業中得來的。大多數的人口居住在鄉村，只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人口住在城市。在維新前國內政治和財政上曾是不統一的，各個封建的王侯各自爲政，各自徵收賦稅，各自發行紙幣，阻礙商業的流通。在維新前日本也曾受過外國的壓迫，在一八五三年美國的艦隊在海上將皮列統率之下，曾經砲擊日本的港口，要求與日本通商。

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不是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的改革，它沒有推翻國內封建的統治，而只是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大地主貴族的妥協。自明治維新後，日本開始形成爲近代的民族國家，開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自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年）至第一次中日戰爭的前夜（一八九三年），在這二十五年的期間內，日本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第一、就農村經濟

來說：一八七二年日本政府頒佈了土地改良的法令，准許土地自由買賣，並確定了用貨幣地租代替物品地租。自該法令頒佈和實行後，加速了日本農村經濟商品化的過程。在戰爭前夜（一八九三年）日本股份公司投資到農村經濟中的資本已有三百萬日洋。在同年日本耕地面積約有二、七四六萬公畝，產米約有六、七三〇、〇〇〇噸，產生絲約有六、六五六、〇〇〇公斤。

第二、就工業來說：在戰前（一八九三年）日本工業的發展情形，如下表：

煤的生產量：三、一七七、〇〇〇噸
 煤油的生產量：一四、〇〇〇噸
 鋼的生產量：一八、〇〇〇噸
 紡紗錠子總數：三八二、〇〇〇支
 棉線：二一五、〇〇〇包

（引自康斯坦丁·包保夫『日本經濟』第二十一頁）

第三、就交通來說：在一八七二年日本建築了第一條鐵路，由東京到橫濱長二十九公里，到戰前（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國鐵路共長三、四一二公里。在一八七一年日本自造第一隻近代汽船，到戰前已共有汽船六四二隻，但是，噸數不多，祇有一五〇、〇〇〇噸。

第四、就對外貿易來說：在一八九三年日本出口總值爲八九·七百萬日洋，入口總值爲一七一·七百萬日洋，入超一倍多，當時日本對外貿易：顯然是對於日本不利的。

自明治維新後，不僅國內在政治上統一起來了，並且，近代的海陸軍也開始建立起來了。至戰前日本海軍共有兵船五十五隻，約共六萬一千噸，但可參加作戰者僅有二十一隻。自一八七三年就開始實行徵兵制，至戰前已有數萬常備軍，日本陸軍的編制，訓練等等皆學自德國，而海軍則學自英國。總而言之，自日本明治維新以後，至第一次中日戰爭前夜，在二十五年

中，日本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向外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之一。尤其是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沒其經過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國內封建勢力沒有消滅，大多數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困苦，他們的購買力很低，國內市場很狹小，因此這種趨向特別表現得清楚。日本資本主義向外爭取市場和殖民地，選擇那一個方向呢？向東方發展麼？東方是太平洋，太平洋東岸是新興的富強的美國，向東發展是困難的。向北發展麼？北方氣候比較寒冷，物產比較欠豐富，並且已被軍事強盛的沙皇帝國主義所佔，因此，向北發展也是比較困難的。向南發展麼？南方氣候適宜，物產也豐富，然而已被當時資本主義的列強英、法、四等國所佔，難於插足。向西方亞洲大陸上發展怎樣呢？亞洲大陸上物產豐富，人口衆多，氣候適宜，恰恰又是老大的落後的滿清帝國。真是像斯大林所說的：「中國沒有重工業，沒有軍事工業，祇要不是懶漢，誰都去啄食它。」

因此，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統治階級就確定了向大陸擴張的方針，確定了所謂大陸殖民地政策。

(二) 戰前中國的經濟政治狀況

在第一次中日戰前，我國已遭受了三次對外戰爭的失敗（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中國的藩屬如安南、緬甸等地都失掉了，所餘者僅僅一個朝鮮，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大降低了，逐步向殖民地化的道路上走。

太平天國革命本是反滿族的資產階級性農民戰爭，它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終因在帝國主義直接鎮壓之下，遭受了嚴重的失敗，因此，國內封建的勢力不僅沒有被推翻，並且因革命的失敗，國內政治益趨向於反動。

因此，那怕我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在一八六二年已開始建立近代的工業，然而，由於我國在戰前既未有勝利的資產階級革命，也沒有經過資產階級的改革，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不僅落後於當時經過了資產階級革命的英、法，並且落後於經過了資產階級改革的日本。

在戰前我國近代工業之發展，約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軍用工業時期，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八一年。在此二十二年間所設立的工廠，有江南造船廠，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江南製造局，南京機器局，福建機器局，四川機器局，吉林機器廠，安徽軍械所，蘇州製砲局等。（見李達：

「中國產業革命概論」第五十九頁

第二個時期為官辦和官商合辦工業時期，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在這個時期內除發展軍事工業外，已開始發展近代的輕工業。在這個時期內我國所建立的工廠如下：

- 「一八八二年 李鴻章奏請在上海試辦機器織布局。」
- 一八八三年 上海商人祝大椿於上海設立源昌五金機器廠（資本金十萬元）。
- 一八八六年 張之洞發起於廣東創辦絲綢局。
- 一八八七年 張之洞請於廣東設立機器鑄錢局及銀元局。
- 同 年 李鴻章於天津機器局購機鑄錢，定名「寶源局」，又於保定設廠。
- 一八八八年 貴州省鎮遠府青谿縣設立官商合辦之製鐵廠。
- 一八八九年 張之洞在廣東奏設織布局及製鐵局，向英國定購鑄爐，移到武漢，設立漢陽鐵政局，（即今之漢陽鐵廠）。又於漢陽設立槍砲廠（即今之漢陽兵工廠）。
- 一八九一年 上海道台唐松岩於上海設立官民合辦之紡紗局。
- 一八九三年 張之洞在武昌設立織布局紡紗製絲四局，後改名湖北紡紗織布局（今由楚興公司租辦）。
- 同 年 李鴻章發起建設之上海機器洋布局，於竣工時被燬於火。
- 一八九四年 盛宣懷由李鴻章奏派集集民間股本，重辦洋布局，因設少改設華盛紗廠（即今之三新紡織廠）。
- 又是年湖北成立聚盛昌等火柴公司，官股佔大部份。

（引自李達，「中國產業革命概論」第六一——六三頁）

從上表看來，在戰前第二個時期內，每年所建立的工廠不過一個至四個而已。在這個時期內我國近代工業發展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正與第一個時期差不多相同。在第二個時期整整十二年當中，我國所建立的工廠，如在當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則不要一年的功夫就夠了。在戰前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不僅落後於當時的英、美、法等國，並且，落後於當時的日本。

在戰前我國交通之發展，亦曾落後於日本。在一八六七年我國曾由英國商人建築了第一條鐵路，自上海到吳淞，但因為受到當時封建勢力之反對，該條鐵路被拆毀了。至一八九〇年我國在英人技術幫助之下，建築了自唐山

至北塘河間的鐵路，至一八九四年該路西通天津，東通山海關，為我國第一條鐵路；而日本全國的鐵路在此時已有三、四一二公里。至於我國近代航運事業之發展，在一八六七年我國即已成立招商局，然而，在同年英國太古輪船公司亦成立於中國，因此，我國近代航運事業一出世就與英國相競爭。英國太古公司在我國內河及沿海享受航行權，阻礙我國民族交通事業之發展，實甚明顯。

至於我國戰前農村經濟，自三大對外戰爭失敗以後，帝國主義侵入我國農村，農村手工業陷於破產，商品經濟較快地發展；然而，整個農村經濟還是停滯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生產技術上面，當時還是封建的農業經濟，投資農業經濟尚付缺如。戰前我國耕種面積與全國收穫量沒有精確統計。當時我國對外貿易總值大於日本，雖然也是入超，但不像日本入超一倍多。例如在一八九五年輸入為一七一、六九六、七五兩（關平銀一〇〇兩等於規元銀一一一兩四錢），輸出為一四三、二九三、二一一兩。入超二八、四〇三、三〇四兩（引自陳廉編『中國商業史』第一四四頁）。

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前我國軍事力量已與第一次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不同，已建立起近代的海軍，僅北洋海軍新舊兵艦就有二十五隻（但實際參加海戰者僅北洋的海軍）。在數量上來說：在戰前我國海軍與日本海軍相差不過；就質量來說：則中國海軍落後於日本。戰前全國陸軍約有八十萬人，內分族營、綠營、湘軍及淮軍四部份，訓練、裝備等等在當時甚落後，談不上為近代國防軍。

（三）戰前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
自明治「天皇」確定了大陸政策以後，就開向亞洲大陸侵略。在戰前中日兩國外交關係上，有三件較大的事情，可足敘述：
第一、在明治維新後第四年（一八七一年），日本併吞了我國藩屬琉球，照會各國，聲稱琉球歸日本。後於一八七九年正式廢琉球王，改設沖繩縣。

第二、一八七四年日本征台灣，中國政府曾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由關建發兵一萬人，往援濟，向日本要求撤兵。英國因恐損害其在華貿易，乃從中調停，訂中日條約，日本撤兵台灣，中國給日本賠款，並正式承認琉球為日本的殖民地。
第三、在戰前十年（一八八四年）日本駐朝鮮使館，私藏槍械，策動反對朝鮮政府的政變，曾殺朝鮮輔國閣台鎬等八人，欲廢朝鮮王。這種利用外

交官的特權，把使館作為推翻當地政府的軍事陰謀機關，實屬外交上未有之先例。中國政府應朝鮮政府之請求，派長慶往朝鮮靖亂，平之。日人乃自燒使館，反說是朝鮮人燒的，以此為藉口，向朝鮮提出許多無理的要求，如賠款，駐兵京城等等，朝鮮政府被迫答應之。

次年（一八八五年）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在天津訂約三款：「一、中日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退。二、朝鮮練兵兩國均不派教練官，三、將來如兩國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告知。」（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下冊第三六七頁）是為中日天津條約。

只從上述三件較大的事變看來，已看出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前已是實行強盜的殖民地侵略政策，而第一次中日戰爭不過是日本執行這個政策的另一個手段——暴力之繼續罷了。

二 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性質問題

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就日本一方面來說：究竟進行了什麼性質的戰爭呢？就中國一方面來說：又進行了什麼性質的戰爭呢？

首先就日本方面來說：日本是進行了掠奪性的強奪殖民地的侵略戰爭，我們有以下的根據：

第一、就日本進行戰爭的原因來說，正如像我們在前而已經指明過的，在戰前日本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而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向外爭奪市場，爭奪殖民地。因此，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政府，曾確定了所謂大陸政策，即強盜的殖民地政策。而在戰前日本已征服了我國藩屬琉球，把琉球吞併了；後來又曾企圖征服台灣及朝鮮，都曾遭受了失敗，而只得對了一些賠款與特權，雖非殖民地大陸政策之全部暴露，已可看見其實行這個政策的企圖與步驟。而第一次中日戰爭正是日本實行這個強盜政策之繼續，也是這個政策第一次的大暴露。列寧常常指出：「戰爭是政治另一個手段——暴力——之繼續」，因此，特別着重的指出：要決定每個戰爭的性質，必須詳細研究戰前的政策。列寧的這個指示，在這裏也是適用的。

第二、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日本作戰的目的，在表面上說，是為了朝鮮的自主，實際上是為了把朝鮮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在戰後適當時機（一九〇一年）日本果然把朝鮮正式吞併了，甚至朝鮮自主的空招牌也不要了。就是在當時也看出了：這是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條約者非中國，而是日本。因

為依照該條約第三款「將來如兩國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中國在戰前應朝鮮政府之請求，派兵往朝鮮時，曾行文知照了日本政府。亂平後，我國政府根據該約第一款「兩國駐屯朝鮮兵，各盡撤退」之規定，行文知照日本政府，請兩國同時撤兵，而日本政府却公然拒絕。日本政府不僅破壞一八八五年天津條約之願守條約自朝鮮撤兵，並且又重覆一八八四年的故事，利用日本駐朝鮮公使為根據地，陰謀危害朝鮮王，而有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之政變。「日本駐朝鮮公使大島圭介，率兵入王宮，殺衛兵，擄朝鮮王李熙，以親日之大院君主國事。……凡朝官不親日者皆逐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下冊第三七一頁）這是證明：日本不僅破壞天津條約，不願撤兵，並且進一步干涉朝鮮內政，破壞朝鮮的自主，甚至利用外交之特權與使館，進行殺害使館駐在國之政府首領，其卑賤野蠻，實達到極點。

第三、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日本作戰的目的不僅是把朝鮮變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並且把台灣和遼東半島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變作進攻東北、華北及華南之軍事根據地。根據馬關條約，日本確實割得了我國的台灣與遼東半島，後因三國干涉還遼東而把遼東退還我國了，但殖個殖民地政策不僅沒有放棄，而且變本加厲，得寸進尺，逐步進迫我國，而演成目前嚴重的國難。第一次中日戰爭實為最重要關鍵之一。正因為日本作戰的目的，不僅是強奪朝鮮，並且企圖奴役我國；因此，當我國海陸軍已退出朝鮮領土和領海以後，當日本已佔領朝鮮以後，日本還不停止戰爭，而繼續向我國內地進攻。

根據以上這些鐵的歷史事實，因此，我們斷定：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從日本一方面來說，日本是進行了掠奪性的強奪殖民地的侵略戰爭。現在我們再來研究：從中國一方面來說，中國是進行了什麼性質的戰爭呢？能否說中國是像日本一樣進行了掠奪性的侵略戰爭呢？我們認為不能這樣說。因為：

第一、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前，中國已經是三次對外戰爭失敗後的國家。中國已踏上了半殖民地的道路，不僅失去了藩屬如緬甸、安南等等，並且，本國經濟上及政治上之獨立及領土之完整，尚且不能自保。當時中國境內各民族，雖然就對內民族關係來說：當時滿族是統治的壓迫民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被統治的被壓迫民族；然而，就對外的民族關係來說，當時中國境內各民族都已變成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

第二、就中國作戰的原因來說：不是由於當時中國資本主義之高度發展，因而引起中國同日本為重新分配殖民地而進行戰爭；而是，恰恰相反，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滿清政府的腐敗不堪，軍事國防上的沒有準備，文化教育上的不發展，引起日本向大陸發展的野心，引起日本把朝鮮和中國當作宰割的對象。

第三、就中國作戰的目的來說：不是要保持朝鮮的存在，以威脅日本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恰恰相反，當時中國同意不干涉朝鮮內政，中國同意把自己的軍隊從朝鮮撤退出來，以保持朝鮮為中日緩衝區域；而日本却不同意把自己的軍隊從朝鮮撤退出來，却堅決主張干涉朝鮮內政，並決心把朝鮮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變成準備進攻中國的軍事根據地。關於中國當時主張不干涉朝鮮內政和主張雙方撤兵，以保持朝鮮為中日緩衝區域，可從當時中國致日本照會看出來。如我國駐日公使汪鳳藻受本國政府之訓令，致書日本政府謂：「整頓內治，任朝鮮自為之；我中國不願干涉。貴國既認朝鮮為自主之國，尤不應干預其內政；至彼此撤兵，請精和約專條行之。」（「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下冊，第二七〇頁）

根據以上所述，因此，我們認為：不能說中國也像日本一樣，進行了掠奪性的侵略戰爭。但是，一方面由於當時中國政府是一個滿清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反動政府，它的對外政策是出賣民族和國家利益，它的對內政策是排擠和壓迫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並且絞殺和壓迫一切進步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由於當時我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而祇是處在產生的過程之中，資產階級的政黨既未出現於政治舞台，無產階級的政黨也還未曾產生。因此，當時我國還沒有和不能發動和開展像目前我國所進行的真正人民底民族解放戰爭。

三 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發展過程

我們從政治的觀點上，研究了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後，現在從軍事的事實點來研究這次戰爭。從這個戰爭發展的整個過程看來，這次戰爭既非兩個戰略階段的戰爭，亦非三個戰略階段的戰爭，而是一個戰略階段的戰爭。因為，自戰爭的開始到戰爭的結束止（自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中日兩國正式宣戰起，至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馬關條約簽字止），整個戰爭進行不到一年，從戰爭開始至戰爭完結，只是日方的戰略進攻，我方的戰略防禦，以致失敗而

結束了戰爭。我方既未經過短期的過渡，由戰略的防禦轉為戰略的反攻，以戰勝日本；也沒有經過比較長期的戰略相持階段，經過準備反攻力量階段的，然後轉為戰略的反攻，以戰勝日本。從軍事觀點來看，雖然，第一次中日戰爭與以前的各國三次對外戰爭相比較（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及中法戰爭），敵我力量不同，具體的歷史情況不一，作戰的地域及軍事技術等方面都不相同；但是，這次戰爭與以前的三次對外戰爭一樣，都是一個戰略階段的戰爭，這都是由於當時的特殊歷史條件與主觀能力之差異所決定的。首先是因爲，在當時的我國，那怕經過了三次對外戰爭之失敗，並沒有經過內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之勝利，也沒有經過資產階級的改革之勝利，未能由一個弱國轉爲強國，因此，在第一次中日戰爭時，雖然日本非如英、法之強，但對當時中國來說，仍爲強國，我爲弱國。此外，加上我國政府及軍事領導者之許多錯誤，造成了這個戰爭只是一個戰略階段的戰爭，而非兩個或三個戰略階段的戰爭。

第一次中日戰爭整個發展過程雖然不到一年，雖然它只是一個戰略階段的戰爭，但也可分爲兩個作戰時期：

第一期作戰在朝鮮領土內及領海內（一八九四年六月——一八九四年八月）。在這個時期內，中日海軍的戰鬥有二，即是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牙山附近的海戰與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在鴨綠江口大東溝的海戰。在這個時期內陸軍的作戰也有兩個較大的戰役，一爲成歡之戰，一爲平壤戰役。現在先述中日兩國的海戰。

（一）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牙山港附近海戰。當中日關係緊張，兩國尚未正式宣戰以前，李鴻章爲着援助在朝鮮牙山中國駐軍葉志超部，乃會派方柏謙帶濟遠、廣遠及廣乙三兵船，護送麥仁、飛鯨運兵往朝鮮牙山。該兵船及運兵船於六月二十一日抵牙山，六月二十二日起卸兵勇、軍裝、馬匹、大米等；六月二十三日晨出港，遇見了三日艦，一名吉野（旗艦），二名浪速，三名不詳。中日雙方海軍相遇，發生了海戰，日本開始砲擊，擊中了中國旗艦濟遠號，死十八人，受傷者四十餘人。日方浪速號亦受傷，旗艦吉野號則否。兩國海軍正在海戰時，在西南方忽見煙起，中國兵船操江號護送商船高陞又至，高陞載華軍九百五十人。日方亦有兩兵船在後尾追。中日海軍再戰的結果，中國商船高陞號被擊沉，由英、法、德三國兵船救出中國兵士長官二五二人，其餘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國兵員都死於海中。廣乙號擄獲，

被焚燒了。操江號被日本所俘虜。在中日尚未正式宣戰以前，日本海軍即不顧國際公法，首先向我國商船進攻，而我國初次海軍亦失利。特別是高陞商船被擊沉，既使牙山駐軍處於孤軍無援的苦境，又在戰爭之初，在精神上即與我國海軍以打擊。

（二）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在鴨綠江口大東溝的海戰。原來李鴻章於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三日派招商局五隻商船，載華兵八營，由大沽經大連，運兵往鴨綠江口之大東溝；另有十隻兵船護送，爲定遠（旗艦）、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廣甲、超勇、揚威。該艦隊於八月十七日晨自大連出發往大東溝，當日午後即抵大東溝。平遠及廣遠在口外下錨；另有見日艦十二隻，自西南向西北行駛，向中國海軍來攻，日艦次序爲吉野（旗艦）、松島、橋立、秋津洲、浪速、扶桑、高千穗、赤城、比叡、清田及西宗丸。雙方海戰的結果，中國海軍大敗，中國兵船四隻（揚威、致遠、經遠及超勇）被日砲擊中，沉於海中，與船沉海中者六百餘人，餘各艦多皆受傷，在船上陣亡者九十餘人。日方則未沉一船，受傷船五隻，兵士長官陣亡者一五四人，長官受傷二十六人，兵士受傷者三八一，不知下落者四十餘人，死傷亦共有六百餘人。兩次海戰的結果，給我國海軍相當大的打擊，特別是八月十八日鴨綠江口的海戰，爲我國海軍的黑暗一天，實爲每個愛國同胞所不能忘記的日子。

現在再來敘述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國陸軍的作戰，在第一期陸軍作戰中較大的戰役爲：

（一）成歡之戰。葉志超軍駐朝鮮牙山，聽說高陞船被擊沉，處於孤軍無援之苦境。其部將聶士成向葉建議說：「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則背山面江，勢便利，戰而勝可據守以待後援，戰不勝猶可繞道出也。」志超從聶士成言，退出牙山，志超退至公州，令聶士成率五營守成歡驛，日軍來攻，兩軍相戰於成歡，我國海軍先勝後敗，葉成歡、公州，繞道至平壤，與我國大軍相會合，行軍兩月餘，自朝鮮南步行軍至朝北，實亦非易事。

（二）平壤戰役。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國陸軍在平壤之戰，有如海軍在鴨綠江口之戰一樣遭受了大的失敗。原來我國軍隊集中平壤，共有二十九營，約有一萬四千餘人。馬玉崑部守大同江，在平壤之東；在寶善部守元武門嶺，葉志超則駐軍平壤城內。日軍先攻馬玉崑部，失利。乃改用大迂迴戰路，

總進而攻下元武門嶺，包圍中國軍，並截斷中國軍隊的退路。馬玉崑見元武門失守，乃亦歸平壤，而被日軍包圍於平壤城。葉志超見勢不佳，不得不棄平壤北走，中途又中了日軍埋伏，又死二千餘人，軍器密電碼文書等皆失掉了。我國軍隊在此一戰遭受了一個大的失敗。平壤戰敗以後，聶士成向志趣建議：守安州及定州；志趣不從，放棄安定二州不守，一直退走五百餘里，渡鴨綠江而至安東九連城。自此次戰役後，在朝鮮境內沒有我國一個兵和一隻兵船了。全朝鮮為日軍所佔領，因為，當時我國軍隊及朝鮮政府沒有發動人民起來抗戰，因此，在朝鮮境內亦無游擊之活動。

第二期作戰在我國領土及領海以內。(一八九四年九月至一八九五年四月)在第二期作戰中我國海軍有保衛旅順之戰及保衛威海衛之戰；我國陸軍則有奉東戰役及遼東戰役。現在先述我國陸軍之作戰：

(一)奉東戰役。我軍自平壤失利後，退守奉東鴨綠江邊，我國軍隊集中在奉東一帶約有七十餘里，坐守一月餘，而未出兵朝鮮與敵戰，給敵人以可能在平壤戰役後，鞏固其在朝鮮之地位。我軍在奉東採取防禦姿勢，以宋慶義士成爲中路，宋慶守九連城，聶士成守虎山，左翼爲依克唐阿，亦沿江佈防；右翼爲豐仲阿及聶桂林，守安東。日本開始從正面進攻九連城，在義州僞作渡河狀，實際上却自日軍右翼渡河東攻，將我左翼軍擊潰了。日軍連即乘夜進發，攻九連城，九連城陷於敵手，虎山亦被敵佔領，我國軍隊退守鳳凰城。日軍又分隊攻我右翼，我右翼軍亦被擊退。

(二)遼東戰役。我國陸軍在奉東鴨綠江邊戰敗後，退守遼東。此時日軍第二軍已攻下遼東之金縣、大連灣等地，與進攻奉東日軍第一軍相會合，在遼東又擊敗了我軍。

在第二期作戰中的海戰爲：

(一)保衛旅順之戰。我國海軍自鴨綠江口戰敗後，一部份兵艦回旅順，另一部份回威海衛。旅順軍港已有相當的建築，丁汝昌亦在此。日軍攻旅順的戰艦不自正面，而自魏子窩登陸，先陷金州及大連，從後面包圍旅順。日軍於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攻下旅順，在日軍入旅順前，旅順守將趙懷益不聽丁汝昌的建議，丁汝昌曾建議守後路，而懷益却回答說：「吾奉令守砲台，不聞赴後路備敵也。」到日軍在魏子窩登陸時，趙懷益早已棄大連而逃之夭夭了，日軍乃得大砲二百二十餘尊，砲彈槍械無算。

(二)保衛威海衛之戰。日本陸軍既佔我遼東，又攻下旅順，乃在遼東

改取守勢，而集中海陸軍，來攻我威海衛，以備從關外而內及自山東而北上，攻我京師北京。日軍攻威海衛亦採取聲西擊東的辦法。日軍於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兵艦三隻攻威海衛之西方重鎮登州，以便吸引中國軍隊，去保衛登州，我國軍隊果然中計，分兵保衛登州，以防日人在該處登陸。日本却伴攻登州，而以主力攻下威海衛之東方重鎮榮成城，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落鳳港登陸，榮成失守。二十八日又在離威海衛東一百里之成山鎮登陸，日軍自背面來攻威海衛，正面却只有日本兵艦二十五隻，在港外包圍封鎖。日軍先攻下威海衛南幫砲台三座，在南幫砲台被敵攻擊甚危急時，丁汝昌會主張在危急情形之下而放棄砲台時，應實行破壞的工作；威海衛守將戴宗鏞不聽丁汝昌言，反密電李鴻章，謂丁汝昌有通敵的嫌疑，真是愚蠢到極點。結果，當日軍佔南幫砲台後，以我國砲台之大砲擊沉我國在港內兵艦定遠、來遠、威遠及靖遠四隻。時丁汝昌在鎮遠，那怕敵人如何刁誘，那怕敵人如何勸降，那怕落後士兵如何威脅他向日投降，但他終未屈服，後見勢不可救，在鎮遠船上自殺而殉國，我國喪失了一員勇將。我國十二隻魚雷艇欲逃出，亦被日軍所虜。我國經營數十年的海軍精銳，在此次戰爭中，幾完全被毀滅了！

我國海軍既大敗於日本，當時滿清政府政治黑暗，在戰前既無充分準備，在戰時又不發動全國軍隊與人民，去一致對外抗戰，並且，政府本身又無堅持抗戰到底之決心，乃急於派使向日妥議投降。先派天津海關稅務司外人德璉琳爲媾和使節，被日本所拒絕。再派張蔭桓及邵友謙爲議和大使，又被日方拒絕。第三次派李鴻章爲全權大使，赴日講和，經過幾度談判之後，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訂中日和約於馬關，是爲馬關條約。後因德、法、俄國之干涉，強制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我國。

四 第一次中日戰爭的影響

第一次中日戰爭對於我國、日本和整個遠東的形勢，起了很大的影響。首先對於我國來說：這些戰爭之失敗比過去三次對外戰爭失敗之影響更大百倍，因爲，在過去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在中法戰爭中，我國雖然失敗，然而，因爲英、法是當時世界上同等列強，並且，我國失敗亦未若如這次失敗之慘，因此，尙未完全親破我國之虛實。到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後，以東方後起之小國日本，竟能戰勝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足見中國之

無能與不進步。因此，自此次戰爭以後，不僅完全確定了我國之半殖民地之地位，並且，引起了我國有直接被瓜分和亡國之危險，就是說：有由半殖民地變為完全殖民地之危險。戰後各國為借款給中國之暗鬥及一八九七——九八年劃分中國勢力範圍之鬥爭，即為證明。

此外，我國賠款現金兩萬萬兩，現金流出國外，統治階級加倍剝削人民。不僅歐美資本主義猛烈侵入中國，而且，亞洲新起的日本資本主義亦猛烈地向我國進攻，而我國民族資本主義之發展更受阻礙，而我國農村經濟及原來我國資本主義以前期的手工業及家庭工業更加流於破產，人民之生活因之更加痛苦和不安。

第一次中日戰爭之失敗，更加揭露了滿清政府之腐敗。統治階級之統治原來已是動搖的，因這次對日戰爭之慘敗，而更加促進了滿清朝廷統治之動搖與崩潰，因而在戰後更加產生了我國人民的民族覺醒，產生了新的革命政黨與革命領袖——興中會及孫中山，也產生了改良主義的維新黨及其領袖——強學會及康有為、梁啟超。

第二、第一次中日戰爭對於日本影響也是很大的。日本從這次戰爭中得到了兩萬萬兩的現金賠款，得到了大塊肥沃的殖民地——台灣及澎湖列島，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較快之發展，並使日本帝國主義開始過渡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因為，日本統治階級的大地主與大資產階級對外侵略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因此，間接打擊了國內真正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把日本工農及一切勞動人民對內的不滿意，轉移到對外政策的侵略，因而遲延日本國內社會矛盾之爆發，遲延日本國內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之爆發。

第三、第一次中日戰爭對於整個遠東及世界形勢，亦有重大的關係。首先是英國在遠東政策之變動，英國由戰前聯俄制俄的政策，變成了聯日制俄的政策，這便一來，世就加強了日俄之矛盾，英日之親善，以至後來英日之同盟，及日俄之戰爭。

在戰後雖然德、法、俄三國聯合干涉，強制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了；然而，在還遼以後，為着借款給中國的問題，法俄兩國與德國引起了激烈的鬥爭，這是法俄兩國與德國在歐洲的鬥爭，反映到遠東中國問題上來；同樣，因中國問題上法俄兩國與德國之鬥爭，也就更加深他們在歐洲之鬥爭，一直走到後來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

日本在太平洋西岸上之強大，對於東岸之美國是不利的，因此開始了日

美在太平洋上之鬥爭。在為爭取太平洋上的霸權而鬥爭中，除當時的英、美、法、俄外，新增加了一個後起的日本。這一鬥爭演變到現在，愈演愈烈。這就是第一次中日戰爭對於我國、日本及遠東之影響。

五 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我國失敗的原因及其對於目前我國民族抗戰的教訓

在第一次中日戰爭失敗的原因，有客觀的原因和主觀的原因。就當時歷史的客觀條件來說：敵是新型的資本主義的強國，我是半殖民地的封建的落後的弱國，這在我們面前講戰前中日兩國經濟政治情況時，已經指出來了。

然而，我國之所以失敗，除了客觀原因外，還有主觀的原因。例如：

第一、當時我國的政府是腐敗的黑暗的滿清專制政府，它對內實行慘酷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就是對外來說：那怕二次對外戰爭的失敗，却是仍然只顧維持統治階級的狹隘的官庭利益，而不顧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如像我自一八八八年起，未曾購一隻兵船，而把建立海軍的國防費用，移作慈禧太后修廟和園建二千萬兩之多。加以滿清政府的官僚們貪污腐化，把購買國防軍艦的款項，飽肥私囊。如「中東戰紀本末朝野九記」云：「中國當承平之際，人不論文武，官不論大小，牛皆徇私而忘公。旅順威海衛既遭砲台，其安置於台上之砲，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經售砲械之人，固儼然官也；祇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為利，假如一砲也，報銷千金，經手者侵蝕二、三百金，售主則以但價五、六百金之砲應命，皆不問其為可用否也。」（「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第三十三冊第三十六頁）此外，如威海衛守將私自剋扣軍餉甚多，當日本攻威海衛時，事先令其手私自將剋扣的軍餉現銀八千餘兩，運回自己的家鄉。這些事情很多，這不過是一、兩個例子吧了。

第二、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敗和黑暗的統治，它不僅給人民一些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等之民主自由，以動員各階層的人民與國內各民族，去一致對日抗戰；並且，未能動員全國的海陸軍和全國的物力財力，以對日作戰。在當時我國「水陸有南北洋閩廣之殊，陸軍有湘、淮、旗、綠之別，明知兩軍相見，彼此不能救應」。（同上書第三十三冊第十七頁）在第一次中日戰爭時，誠如外人所言：「非中國與日本戰，實李鴻章與日本戰；大多數中國人於陸戰尚夢然不知也。」（同上書第十八頁）甚至有可恥的事情，如

廣東中道名利炳者，曾致函日本海軍提督伊東請求日本發還廣東兵船廣乙號之無形交涉。他在致伊東信中曾講到：「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向隸廣東，冠以廣字，可為證明。查廣東一省本與戰爭不相干涉，今日甲乙遭水火之災，僅存一丙，北洋已無以對廣東。望貴提督念廣東為局外之義，並念該艦管帶官張副將，日來有往返傳語之勞（按即往返商投降條件之語），所謂張副將即程璧光）可否提出該艦，即交該副將帶回廣東，俾得於總督前略存體面，不勝感激。」（同上書第十八頁）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確實只是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及陸軍與日軍戰，而其他各省多以「與戰爭不相干涉」，自視為局外之人，這是如何沒有民族與國家觀念啊！

第三、當時我國軍隊的軍事訓練與兵士的政治覺悟異常不修，軍紀敗壞，軍民關係惡劣到極點，因此，那怕這些戰爭關連到我國國家及民族之後果命運，然而，人民對於戰爭却甚冷淡，不但不幫助軍隊，且對日作戰，反而害怕軍隊，見了軍隊就逃跑；實由於軍紀太壞之結果。如李鴻章致平壤豐、衛、左、馬各統領電報中曾云：「頃據委員稟報，由義州至平壤數百里間，商民均逃避，竟有官亦逃避；聞其緣由，因前大軍過境，被兵擄奪異常，竟有燒屋、強姦事情。定州燒幾及半里，沿途鍋掛、碗碎各情，聞之髮指。……再將掠民牛數千條，究落於何軍何營，查交地官歸還於民。」從李鴻章這個電報，可以看出：我國在朝鮮軍隊的紀律是如何之壞。當時我國軍紀之壞，不僅在朝鮮如此，在本國內亦然，當時在奉天民間竟有「不畏日本長官兵」之語，亦可見我國軍隊對於人民的關係是如何之惡劣啊！

第四、由於我國軍事戰略上之錯誤，我國軍隊採取消極的單純的防禦而非積極的防禦；多處於被動地位，而少爭取主動地位；行動多遲緩，而不迅速，以致失掉時機，完全是進行陣地戰，而未進行運動的防禦與游擊戰。例如：當時我國政府直到戰爭前夜，尚無抗戰的決心，希望由英調停而不戰，以致日本利用這個時機，增派大軍一萬餘人先至朝鮮京城，而我國則坐候時機，未派軍隊先至朝鮮，以致救在朝鮮的孤軍。正如當時日本政府要人陸奧宗光所云：「在豐島為我軍艦（日自稱）浪速所砲擊之英船高陞號所搭載之華軍，即此增派兵之一部。故清庭若容納李之建議，早日實行增兵之計，則高陞號之奇禍可免；駐牙山、成歡之葉、聶二將，開戰時亦得優勢之兵力。」（同上書第二二—二三頁）又如當時我國軍隊已集中平壤時，本因直趨朝鮮京城，不應把二十九營軍隊，約一萬四千餘人都集中在平壤，而應擇險分屯，互相策應才對。又如平壤我軍失敗後，在奉天戰役時，聶士成謂「願率精銳千人，直出敵後，往東游擊，截後道，焚積聚，多方擾之，令彼首尾兼顧，然後以大軍登之，倭可克也。」（同上書第一十四頁）這就是說：聶士成主張在敵後發展游擊戰爭，以疲勞和牽制敵人，這種戰略與

戰術甚為正確，在當時宜採用，然而，聶士成這一主張未能得到諸帥之採納，實亦可惜！

第五、由於我國當時軍隊的指揮官多屬貪生怕死與愚昧無知之徒。如海軍濟遠號艦長方柏謙曾向日投降，在這次戰爭中投降日本的我國兵艦共有十隻之多。鎮遠號司令秦會林在與日海軍作戰時，見日本砲彈而跪在船桅上念佛，求佛保佑。在陸軍中如淮軍老將衛汝貴聽自己老婆的話，而不敢當前敵。當時衛汝貴年已六十，其妻致家資給汝貴，在信中寫道：「君起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顧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下冊第三七六頁）而汝貴正真聽老婆信中的告誡，躲藏敵軍，不敢與敵戰，敗逃後，日人得其家書，引在教科書中，以戒日本青年，不要像衛汝貴這樣貪生怕死之徒。當然，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亦有勇敢為國犧牲的民族英雄與戰士，如像致遠艦長鄧世昌當見自己兵艦受傷時，曾欲自己撞沉日本司旗艦吉野號，因中敵魚雷，而未達到目的，鄧世昌及全艦士兵死於海中。又如丁汝昌至死不屈，不怕敵人利誘與威脅，終不投降，迫不得已而自殺殉國。再如陸軍中聶士成亦為難得的一員勇將。然而，這些人總算是最少數，大多數將官是貪生怕死和少謀寡知之徒，我國焉得不敗呢？

第六、由於勤奸工作異常不修。如像在當時天津軍械所的老章手姓劉名素，曾當了日本的間諜，私把我國海軍砲械兵數清單，送給日本。高陞號之著被擊沉，就是因為他之私自密告日本。再如日本海軍在魏子鶴及威海衛附近登陸，皆得力於漢奸之嚮導。日本接受了普法戰爭時德國之經驗，派遣了和組織了大批間諜與偵探，在我國內部活動，而我國當時忽視了反漢奸鬥爭的工作，沒召發動民衆和建立健強特務機關，以進行反偵探的勤奸工作，亦為我國失敗原因之一。

在我們研究了我國失敗原因以後，反轉來研究日本所以戰勝我們的原因除了客觀的歷史原因，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在當時為新起的資本主義強國以外，日本當時政治上也比我國當時滿清政府進步些，軍事指揮也比較統一，動員了全國海陸軍與全國人民，對我作戰，並且，軍事上亦多採取靈活的主動的戰略與戰術等等，亦是日本所以在第一次中日戰爭打勝之原因。

（略一段二百七十字）

假如在目前我國再復前次中日戰爭的錯誤，而又不堅持抗戰到底，而不立即實行民主制度，而不立即實行改善民生，那麼我國將不能勝利地驅逐日寇出中國，而我國將有完全被日本滅亡之危險，我國人民將有永遠變為日本亡國奴的危險，望我國人在研究第一次中日戰爭以後，牢牢記住前次失敗的歷史教訓，而立即糾正前次戰爭中的錯誤啊！



論閃擊戰

邊章五

一、引言。

擁有百萬現代大軍的波蘭，在四個星期以內，便遭受了殲滅。在北歐戰役當中：納粹德國在一天之內，佔領了整個丹麥以及挪威的所有重要港口和飛機場；三個星期便奠定了北歐戰局。在荷比戰役當中：納粹德國在五天之內，摧毀了荷蘭的軍隊，佔領了整個荷蘭和比利時的一半領土；現在還在繼續地發展着。所有這些結果，當然主要是由於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但在軍事方面亦自提供了一些新的資料。於是「閃擊戰」便炫耀一時，為舉世所矚目。究竟「閃擊戰」的理論和技術的基礎何在？納粹德國所施行的「閃擊戰」在軍事學方面提供了一些什麼資料和影響？它的發展怎樣？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採用「閃擊戰」到怎樣的程度？它會收到怎樣的結果？我們應該採用怎樣的對策？愛就管見所及略抒一二提供參考。

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在戰略

思想上幾種不同的趨勢。

殲滅還是消耗？
 速決還是持久？
 攻擊還是防禦？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
 制空還是制海？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後直到現在，在戰略思想方面，顯然地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趨勢。當然，戰略思想的形成和確立，是根據於當時本國和敵國以及第三者的國情和國力，因此各有其特殊的條件而不能盡同。但作為一般研究的的時候，通常是建立在交戰國雙方軍備約略相等的基礎上的。現在我們也就在這個範圍以內提出些材料來研討。

甲、在戰略思想上趨重於消耗、持久、防禦、陣地戰和制海權者。

1. 法國「大軍戰術教程」：「在前次大戰中，……火線延長至若干里，左右兩翼連接着不可超越的障礙物，并借此障礙物以保持陣勢。因為攻擊的力量增進，同時巧妙的防禦組織的價值亦隨之增進；我們可以推想將來或許會發生同樣的情形。」因之力言堡壘的重要；認為為了堡壘，防禦者可以少數軍隊阻止敵人，而自己可在後方從容地調動軍隊。

2. 法國國防總長達拉第在衆議院軍事委員會所宣佈的話；他說：在下次大戰開始時，法國將利用所有強固防禦地位的優勢，在前線採取守勢。蓋拉香白亦說：「在戰爭開始時，單就陣地而論，毫無問題的只有堅決地採取守勢。」萊庫恩說：「將來的戰爭，一定像上次大戰一樣，是一個長久的戰爭。」

3. 英國李德爾·赫德在其一九三九年所發表的「二次大戰中英國的戰略與戰術」一書中，曾有如次的論述：

「現代軍事的基本條件是什麼？第一、與人力相比，機械力的價值日見增加。第二、是從第一點引伸出來的，即作戰能力依賴工業力和經濟資源的程度日益增加。第三、防禦更較攻擊為有利。」

「西戰場的所謂戰役，不過徒然自毀，先則甲方欲攻陷乙方陣線而自招毀滅，繼則乙方欲攻陷甲方陣線而自招毀滅，戰爭根本成爲一種持久力的比賽。其結果全視那一方因作戰能力消耗殆盡而首先毀滅。」

「現代防禦戰術久已證明遠較攻擊為優越。……既因隊伍體質進攻一個難攻不拔的防禦堡壘；自然而然會產生厭戰心理，又會遭遇生產攻擊所必需的大量軍火的工業力的困難。」

「英國之從事一切戰爭，自始至終採取利用海上壘壘和海軍軍力，以有限制的責任——即限制消耗的危險，因為消耗是戰敗最通常的原因——來取勝的政策。英國之從事每一次大戰，總是採取這一種政策，而在歷次大戰中和大戰之後，亦總是獲得任何近代國家所不能有的持續不

變的勝利。」

「攻勢是消耗較大的作戰方式，再沒有其他的作戰方式比得不償失的攻勢更足以毀滅軍力和國家的了。」

「歷史對於具有客觀眼光的學者提供許多證據，證明在敵軍施行攻勢而自傷之後再施行反攻，是最具有決力的作戰方式。」

「現代武器發展的趨勢，特別有利於防禦。」

「我們尤其應該知道，防禦是一種心理的攻擊——攻擊敵國人民的精神和士氣。」

「就局部方面而論，要是條件有利「攻勢為最好的防禦」也許仍然是對的。但就全體而論，在現代的人民戰爭中，一個新真理愈益顯明——防禦為最好的攻勢。」

「英國的問題在於阻止速戰速決——尤要者在於確保其本身，以免受敵命的打擊。」

對於空軍的問題；赫德認為在空戰中，攻勢戰亦是消耗較大的作戰方式，因而亦趨重於守勢。他亦感覺到了「超規模」空襲的危險；但他的結論却是只有對於海外孤立無援的殖民地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亦局部地認識了空軍降落部隊的作用，但他却認為在陸地上兵力密集公路交叉縱橫的西歐，特別是在英國，却是未必有的事情。

對於海軍的問題；赫德認為完成海上控制的唯一有把握的方面是完全毀滅敵方的海軍軍力；在這裏，他並沒有提到空軍可能發生的任何影響；他仍主張履行英國一貫的政策——發展海軍軍力的活動到最大限度，限制陸軍軍力的活動到最小限度。

李德爾·赫德是英國當代有權威的軍事批評家和戰略家；他的戰略思想正在為英法聯軍所採用作為現實的測驗。

乙、在戰略思想上趨重於殲滅、速決、攻勢、運動戰和制空權者。

1. 納粹德國的新史蒂芬計劃仍然是根據史蒂芬集中突擊的精神，益以現代的軍事技術，將機械的陣地變為一種新奇的運動戰。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中寫道：「這是用全部集中的力量，打擊最危險的敵人的問題。」希特勒的親信馬奔和軍事顧問班斯會說：「我們小小的國防力量，不能與武裝精良人數衆多和分佈遼闊的軍隊進行陣地戰。……每次戰爭都有許多出奇制勝的襲擊，勝利總是得之於別人意料不到的所在。」

梅支西在其所著「戰爭發展之趨勢」一文中，有如下的論述：「因為現代空軍和陸軍的各種武器之技術程度都已達到了完滿的境地，在發生於軍備相等的強國間的各種大陸戰爭，當其爆發之初，至少必須採取一種攻勢。」

「陣地戰將成為未來戰爭的一種副產物，……各種永遠設備的堡壘，此時僅具有暫時防禦的價值，但是可用作進攻的絕好的根據地。……如果交戰國雙方均有充分的現代軍備，使用現代的化學方法以作戰的話，那末，作為一九一八年舊意義解釋的陣地戰，在未來的戰爭中將沒有地位了。」

「現在的戰鬥，將與世界大戰時之軍械戰鬥，大不相同。全特交戰國的作戰部隊，在陸地和天空兩方面，具有最大的活動力。所有各種各樣的最堅強的作戰部隊，均將於迅雷不及掩耳之瞬息中，集中於可以得到決戰效果的地點，以作孤注一擲。」

「未來戰爭之特徵，必定是空軍無疑。……在空中已告戰敗的國家，將發現他處於沒有繼續作戰的希望境地，因而停戰求和，亦在未可知之列。」

賽司曲羅夫說：「假使說祇用閃電似的奇襲，去對付準備一切遭遇的防禦力量，決勝是可能的。」就任何情形而論，利用技術上優越的工兵，以一擊之力來獲得決戰的最大的機會，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

塞克特說「戰爭的開端，是空軍的相互攻擊。……只有空軍已被擊破以後，方可轉向其他目標。」

2. 意大利巴里亞里說：「意大利原料的資源是不豐富的，所以他不能從事一個含有大量原料消耗的長期戰爭。而且陣地戰的原則，和法西斯政權的活力的性質，是不相融合的。」

杜黑認為空軍超越一切。他主張陸軍和海軍負責防禦的任務，空軍專負攻擊的任務。

古達且尼尼認為未來的戰爭，是空間的戰爭。無需以前那樣的動員，只要空軍時時保持現代化和時時準備；一旦政府頒發攻擊命令，空軍即可急如閃電，出而攻擊，致勝而畢；其餘則無所需。

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是一貫地堅持和平政策的。工農紅軍的任務，只是「在一切條件下，担負為保障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邊境之不可侵犯及獨立自由的使命」。但一旦遇到了戰爭挑釁者的進攻時，則「將以蘇聯強大的全副武裝力量來粉碎對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進攻，並將軍事行動轉移於進攻之敵的國土的。」在這種軍事行動中：「紅軍的戰鬥動作將採

取噴滅敵，在被牽引在戰爭中的蘇聯，其主要目的是求得澈底的勝利和完全殲滅敵人。」「任何的戰鬥——進攻和防禦——都有取滅敵人之目的，但在主要方面進行堅決的進攻，並繼以勇猛的追求，才能完全消滅敵之有生力量及資料。」「使我主要方向佔絕對優勢於敵人的力量。」「出敵不意是機動和達到戰鬥勝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出敵不意的原則在於隱蔽和迅速，為達到此目的，應當使軍隊機動迅速隱蔽集中，隱蔽準備集中的砲兵火力，砲兵突然開火，步兵坦克的突然進攻以及飛機的突然襲擊。」「突然性亦可用出敵意料之外的採用新的鬥爭武器和新的鬥爭方法完成之。」「現代鬥爭的技術，是可能將敵人整個縱深配備的戰鬥隊形同時摧毀。」「現代制壓兵器，首先為集團使用的坦克、砲兵、飛機和機械化部隊；可以使其同時攻擊敵人整個縱深的戰鬥部署，以達到切斷包圍和殲滅敵人之目的。」「空軍隊是破壞和擾亂敵人的指揮及其後方的有效工具。空軍隊隊若果是與正面攻擊之我軍協同動作時，則對於該方面敵人的殲滅能起決定的影響。」「（以上均見蘇聯於一九三六年頒佈的蘇聯工農紅軍的野戰條令）

戰術思想之分歧，當然基因於哲學思想之不同。有些人們認為戰術戰術只是天才指揮官自由理智的創造品，因而也就不顧客觀的現實，而僅在自己的觀念當中來創造，希圖這樣成為天才的指揮官。但是，客觀事實的說明：戰術戰術是決定於軍事技術，天才的指揮官，在於能使作戰方式更適合於當時的軍事技術條件，更發揮當時軍事技術的效能；這也正是物質決定精神而不是精神決定物質的真理，在軍事藝術方面的具體表現。有些人們認為戰術戰術是萬古不變的，認為戰爭只不過是依樣葫蘆地循環扮演，因而只是機械地在陳跡故紙的範圍內打圈子，而在戰史的研討中，也絕少顧及到當時的軍事技術和一般生產力等條件。但是客觀事實的說明：戰爭和一切事物一樣，在它存在的過程中，是時時在變化和發展着的，戰爭形式之不能重演，也正如一切歷史之不能重演是一樣的；隨着軍事技術和一般生產力之變化和發展，戰術戰術也必然地時時在變化和發展着；而這一變化和發展也并不如拿破崙氏所說必須機械地十年。有些人們認為戰爭只是孤立的武裝鬥爭問題，戰術戰術也只是簡單的軍隊運用的問題。但是，客觀事實的說明：戰爭是階級社會的現象；國家和國家間的戰爭，是整個國家在物質和精神多方面的鬥爭；戰爭絕不是孤立地武裝鬥爭，戰術戰術絕不是單純的軍隊運用的問題。本來由於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把軍事藝術形成為綜合的有體系的科學；可是還有些人們在我行我素地必須等待着客觀事實的證明和教訓。

三、「閃擊戰」的理論和技術的基礎。

「閃擊戰」Blitzkrieg 這個名詞，開始出現在納粹德國，是由德文閃電和戰爭兩個字組成的。顧名思義，可知它的特徵是在突然和猛烈。它開始被大規模地實際運用，亦是在納粹德國。可是，它的理論的形成，並不是納粹德國所專有。實際上「閃擊戰」就是殲滅、速決、攻擊、運動戰的綜合發展；就是一種戰略奇襲。但可是，它的目標和範圍，絕不限於軍事和前線；而是對於敵方的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各方面，前線和後方，進行同時全面的突然奇襲。本來，突然的奇襲，常常可以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收穫；從人類開始發生戰爭以來，它曾經提供了很多的異彩。不過，某種戰術的產生，是根據於當時的軍事技術條件；同時，它的發展，也就受到了當時軍事技術條件的限制。自然，歷史上的奇襲也就各自有其發展的限度。克勞塞維茨以至最近的某些軍事家們認為：奇襲在戰術範圍內容易收到效果；在戰略範圍內，愈接近於政治的領域，或者是對要寨的奇襲，便不一定能達到所期之目的。當然，在克勞塞維茨的時代，由於當時的軍事技術條件，使得大軍的集中，運動和突擊，很難達到所期望的秘匿、迅速和突然的目的；對於敵人全縱深，施行長時間的突擊，更是不可能。但是，現代軍事藝術的條件，已經將這些問題大部解決；即便在戰略範圍以內，即便對於敵人的全縱深，奇襲已不僅是可能，而是現實的問題了。

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表現最顯著的，是在飛機，坦克和空中降落技術三方面。當然，在化學、細菌、電氣以及其他的一些新式武器方面，也都在精研猛進；不過，在這些方面，各國都保持着嚴格的秘密；究竟它們在實際運用的範圍內，已達到了怎樣的水準，還無由詳知。我們將後面這幾項暫置不論；僅在前三者所達到的水準來講，就以往在戰術戰術的變革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有力的資料，奠定了新的作戰方式——「閃擊戰」以實踐的基礎。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想像到，每一種新的主動性的戰爭武裝的繼續出現，也都要將這一新的作戰方式向前發展。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空軍便已經使戰術思想起了大的變動；不過由於當時飛機技術發展的限制，還不能高度地發揮它的效能。現代的飛機，不論在質和量的方面，都有了飛躍的進展（待後分述）。更由於大規模空中降落技術的形成，使陸軍和空軍密切地結合起來。這樣，就形成了真正密切聯繫地三度空間的作戰。地面上固若金湯的防線，不再是不可超越的障礙。明顯的前方和後方的區別不復存在。「閃擊」這個名詞，要改變它的地位和內容。這樣，就使得對敵人的全縱深，施行長時間的突擊，成為可能；對要寨的奇襲，也成為可能了。

現代軍隊組織的要求，須具有高度的運動性，熾盛的火力和猛烈的突擊力。現代軍事技術，在這些方面，都提供了高度的發展，也就給了新的作戰方式以新的基礎。

就運動性來講：在軍用航空方面：一九三九年的常型驅逐機，時速達五百公里；常型戰鬥機和輕轟炸機，時速達四百五十公里；常型中等轟炸機，時速達四百二十公里；常型重轟炸機，時速達四百公里；各種實驗機，則各增加約九分之一。在坦克方面：輕坦克時速為二十四公里；中坦克時速為二十公里左右；重坦克在戰場上時速為四至六公里；蘇聯的基利斯帶式坦克，時速已達六十哩（約九十六公里半）。裝甲汽車平均時速為十五至二十公里，良好路面達六十公里。這樣高度的運動性，不只是工業革命以前所想像不到，即使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相較，就軍用飛機來講，已竟超過了四倍半到五倍。由於運動性之高度發展，使大軍的集中運動，突擊和向敵人深遠後方的挺進，都已經達到秘密、迅速和突然的要求；而戰術奇襲也就成為可能了。

就火力來講：現代火器不論在質和量方面，都遠非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所可比擬。就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前夜，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前夜相較：歐洲軍隊所有的機關槍的數量要多過十五倍到二十倍；大砲的數量，要多過三倍，效能要增加兩倍。法國的一個現代步兵軍，在一分鐘內放射的彈藥總量，達六〇、九八一公斤；德國的一個現代步兵軍，達五九、五〇九公斤。蘇聯的一個現代步兵軍，達七八、九三三公斤。由於高度發展的熾盛火力，提供了集中空前的優勢火力，短促地壓倒摧毀敵人的更大可能。

就突擊力來講：由於飛機和坦克大量優越的發展，使高度的運動和熾盛的火力以及強大的破壞力，密切地結合起來；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突擊力，就坦克來講：在數量方面，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前夜比較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期中最高的數目，也要多過八倍到十倍；在質量方面，可以舉出蘇聯和法國的一兩種來看：法國的巨型坦克，全重七十噸，裝備七公分口徑大砲二門，重機關槍四挺，時速約十公里左右；蘇聯的（T-34）型重坦克，重一百噸，裝備十、五公分口徑大砲一門，或六吋口徑砲一門，三、七公分口徑砲兩門，重機關槍及高射機關槍各二挺，時速二十五哩（約四十公里）。就飛機來講：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開始時，所有交戰國雙方第一線飛機的總數，才不過七百多架，到戰爭最後一年的最高數，也只不滿一萬架。但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前夜，只就英法德三國來講，第一線飛機至少已竟超過了一萬二千架以上。在裝備方面，一九一四年都是小型戰鬥機，裝備只不過機關槍一挺，炸彈重量不過一百五十公斤；到一九三九年，常型戰鬥機已經裝備了三挺機關槍，常型重轟炸機的炸彈重量已經是三噸至五噸，實驗

用重轟炸機的炸彈重量則已達六噸至十噸。一九三九年三月以前的蘇聯空軍，一次投彈的重量，至少已在四千噸以上。益以前述的速度，這已經形成了何等驚人的突擊力。現代的突擊力，即便將陣地砲及其餘的部份除外，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相較，已經是難以用比較來相比擬。正由於這種猛烈的突擊力，對於現代防禦，可以說是無堅不摧了。

一九三九年的常型驅逐機，其最遠航程，已達一千二百公里；常型戰鬥機和輕轟炸機，其最遠航程，已達一千五百公里；常型中等和重轟炸機，其最遠航程，已達四千公里。就驅逐機和戰鬥機來講，比較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初期，已經增加了六倍到十二倍。由於飛機航力的激增，將空間大為縮小；全世界除了個別國家以外，已經使得任何國家的任何一部份領土，無不處於空軍威脅之下而隨時有成為戰場的可能了。在運輸力方面：只就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所未有的空中運輸來講：一個現代的步兵旅，包含所有的各種汽車在內，只須常型軍用運輸機二百二十架，便可一次輸送完畢。更由於裝甲設備和通信技術之進展，使得遠出挺進部隊的迅速擴充和失却聯繫的困難，也都得到相當的解決。這些也都提供了新的作戰方式以實踐的有力保證。

在現代大量優越的飛機、坦克和空中降落的軍事技術基礎之上，集中優勢的兵力兵器，對敵人全線深施行同時間的三度空間的奇襲；這便是「閃擊戰」的技術和理論的基礎。

四、納粹德國所施行的「閃擊戰」在軍事學方面提供了一些什麼資料？

甲、納粹德國幾次閃擊戰的方式。

納粹德國所施行的幾次「閃擊戰」，是逐次發展的。在德波戰爭中：納粹德國是用了陸軍七十幾個師——包含五個機械化師——和近兩千架的第一線飛機，於九月一日開始向波蘭進攻。在地面上：採取兩翼包圍，以大量的機械化部隊，迅速摧破當面的波蘭軍隊——這些軍隊首先大部份又是騎兵！大軍以汽車輸送，隨而擴張戰果。在空中：首先制壓摧毀了波蘭的空軍，波蘭的飛機有些未逃起飛便在自己的飛機場遭到了毀滅；同時大量轟炸波蘭縱貫南北的三條主要交通線，破壞波蘭的集中和運輸；並直接配合了地面上的戰鬥。這樣，在軍事方面，波蘭就在動員尚未完成，部隊分散零亂的情況之下，短短的四個星期，便決定了它的命運。

在北歐戰役當中：納粹德國是以海軍的主力一小部陸軍以及兩千架以上的飛機，趁著北歐戰事正在醞釀而還未發動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

於一日之間，佔領了整個丹麥以及挪威所有的重要港口和飛機場。跟即以大量空中運輸增援登陸的德軍；同時展開了戰爭爆發以來空前的海空大戰；這一海空大戰的結果，由於納粹德國掌握了優勢的制空權，所以對方的艦隊和飛機是傾覆而歸了。在挪威登陸和繼續推進的德國陸軍，則迅速地擴張戰果。掌握了制空權的納粹空軍，則大量轟炸聯軍的艦隊和港口，妨害聯軍在挪威的登陸，拘束聯軍登陸部隊的行動；同時直接配合地面上的戰鬥；在挪威中并會小地採用了降落戰術。這樣，使聯軍在挪威登陸的部隊，也不能不從挪威中撤退，三週的時間，便奠定了北歐的戰局。

在荷比戰役的初幕當中：英法在北歐失敗後，方在另選戰場，企圖發動另外的戰事，納粹德國又以先制的行動，突然開始了對荷比的進攻。正因為荷比戰事和四錢主力戰的不可分割性，所以納粹德國此次所施行的「閃擊戰」也就有了更高的發展。納粹德國在此次戰役中主要的特徵：是大規模地採用了降落戰術；使用了空前大量的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對荷蘭的全境——從國境以至京城——以及比利時的東部，施行同時的突擊。降落部隊曾經獨力地佔領了荷蘭的京城海牙，和比利時的列日最堅強堡壘。五天之內，使荷蘭的軍隊損失了百分之二十五，其最精銳的部隊差不多全部受到了殲滅；歷史上著名的水防工事以及作為最後支撐的堡壘地帶，也幾乎全部失去了它的效用；殘存的軍隊，也不能不最後的屈服。比利時的領土，也在五天之內失去了一半。隨着戰事的發展，馬奇諾防線也跟着威耳防線在岌岌動搖當中了。

乙、納粹德國所施行的幾次「閃擊戰」在軍事學方面提供了什麼資料？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主要戰場上真面目的武裝鬥爭方在開幕，這時候對於一種新的作戰方式就作總結，當然時機尚嫌過早。不過，就是在現在，我們根據一些零星材料，也可以得出若干推斷和參考的資料。

第一、攻擊還是防禦？運動戰還是陣地戰？

儘管人們反對辯證唯物哲學，儘管人們認為戰略戰術只是天才軍事家自由理智的創造品，或者認為陣地戰的產生只是由於防禦包圍受到了自然地阻礙的限制；但是，軍事技術決定戰術，却是一個不易的真理；沒有火器便不會有分散戰術，沒有飛機便不會有立體戰術；儘管人們怎樣地來反對，可是實際上至少是部份的，自覺或不自覺地，他們也在遵循着這一真理。現在我們就根據這一真理，首先來觀察現代軍事技術，是利於防禦還利於攻擊？納粹德國為「在大大戰中，機關槍樹立了守勢戰的優越性，現在機關槍比從前更多了。上次大戰以後改進最多的武器為平射砲和高射砲，這些都純粹是防禦性的；化學武器也具有同樣的偏性。」因此他的結論是「現代武器發展的趨

勢，特別有利於防禦。」我們并不否認，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絕大部份過程中，軍事技術條件是有利於防禦。這不僅表現在機關槍方面，同時也包含着築城技術的較為優越，大砲效能的較為低劣，以及空軍和化學武器的尚處於幼稚時代等項。但在大戰後期，由於坦克的出現，這種情形便已經發生了變動；協約國的最後勝利，在軍事方面來講，也還是由於依靠了優勢坦克所施行的攻勢。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改進最多的武器，絕不但是機關槍平射砲和高射砲；而是飛機、坦克和降落技術；這些武器，固然也都是進攻的武器。在這些現代進攻武器之前，已經大大地剝奪了所有現代防禦武器的抵抗力。地而上固若金湯的防線和堡壘，現在可以超越、可以摧毀。高枕無憂的深遠後方，現在可以隨時踏虛搗隙。優越的防禦火力，現在可以超越其有效射程，可以毀滅其本身。防者固然可以利用撤毒，以阻攻者的前進；但攻者更可利用化學武器，施行突然的襲擊。化學和空中武器的結合，新武器的繼續出現，將更給予攻者以有利條件。納粹德國幾次的閃擊，也說明了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是利於攻者而不是利於防禦。

納粹認為「防禦是一種心理的攻擊」。我們認為在政略範圍內，正確的防衛，是對於侵略者的一種心理攻擊；但在戰術範圍內，在雙方軍備約略相等的戰爭中，則并不如此。自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或者由於軍事技術條件利於防禦；或者由於攻者方面戰鬥指導藝術的異常拙劣；或頓兵堅壘之下戰日持久；或以卵擊石自招損傷；這一種攻擊，當然可以招致人民和軍隊心理上的嚴重打擊。但是在現代軍事技術條件下，戰爭指導藝術只要不是異常拙劣；那末，攻者方面是很容易於獲得最初戰役的勝利。這就使得受心理攻擊最嚴重的，不是攻者方面而是防禦方面。當然，最初戰役的勝負，不一定就是戰爭最後的勝負；但在現代軍事技術條件下，最初戰役失敗後，企圖挽回頹勢，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它的困難——有生力量和資材的被大量摧毀，交通運輸的被大量破壞，以及空間時間的局限等。也許在將來的戰爭中，交戰國再不肯輕視將最初戰役的勝利，奉送給對方。

納粹以攻勢的消耗較大，認為它是最是毀滅自己軍力和國家的作戰方式；因而主張採取防禦，等到攻者消耗自竭之後，再舉行反攻。本來，在軍事技術有利於防禦的時候，攻勢防禦的確是一種較好的作戰方式。這一種戰略思想，在中國絕大部份的時間佔着絕對優勢的地位，亦自有其軍事技術條件的根據的。在這種情況下，攻者是要付出較大的消耗。一九一七年七月，英軍在弗蘭得利的進攻，砲兵準備射擊歷三星期，消耗的砲彈四百五十萬噸，攻勢費時三個月，而其效果則不過是突破了十四公里的正面，前進了九公里；這的確如納粹所說，是一種得不償失自招毀滅的攻擊。可是，即便在軍事

技術利於防禦的時候，也只是在陣地攻擊中，攻者才受到較大的消耗，如果在運動戰中，便常常不如此。在軍事技術利於攻擊，在軍事技術高度發展的現代，在突然的奇襲之下，便更不一定如此。我們也可以想像到，在新的大規模的閃擊之下，防禦者更要付出如何驚人的消耗。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的陣地戰，絕不是由於自然地理限制了運動戰的空間所形成；自然地理在短短的幾千年中間，是沒有大的顯著的變動；而這幾千年中間的若干次戰爭，却并未發生過這種作戰方式。這是一種作戰方式，還是由於當時軍事技術的條件所決定。當時的軍事技術，提供了大量的發達的火器和築城技術，但是防禦武器却優於攻勢武器；因而雙方各思突破對方的防線而均不能達成，隨就形成了粘着相持的形式。可是，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已經是利於攻擊；地面上的堅固陣地，已不再是不可超越的障礙；這樣，就將人們從他們不願意而不能不燒伏的樊籠內解放了出來——自然，仍甘心在牢籠中囚處的人們除外。在將來的戰爭中，像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那樣的陣地戰，雖然會局部地存在；但是，整個廣大的戰場長時期束縛在戰場內的情事，是不會復現了。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如果說在軍事方面，有些國家由於未認清當時的軍事技術是利於防禦，因而不斷地施行盲目的攻擊，結果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以至最後的失敗；那末，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中，也許有些國家，在軍事方面，由於未認清現代的軍事技術是利於攻擊，因而頑固地機械地採取防禦和狹義的陣地戰，結果還要受到更嚴重更慘酷的失敗。也許聯軍方面由於事實的教訓，更對於以勃魯為代表的這一類戰略思想——也就是聯軍現採的戰略——重新加以估價。

納粹德國的幾次戰例，更在事實上說明了：在現代軍事技術基礎之上，在雙方軍備約略相等的情况下，攻者優於防禦；地而上任何堅固的防線堡壘，都不是不可超越和摧毀的障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那樣意義的陣地戰，大大地縮小了它存在的地步。在軍備絕對劣勢的方面；更須儘可能地避免陣地戰；在迫不得已而採取戰時防禦時，也必須積極地爭取戰役和戰鬥的攻勢；戰術攻擊為完成戰時防禦必要手段，還是正確的；如果一味消極地等待接受敵人的攻擊，結果必然是失敗。

第二 戰時消耗是消耗持久！
戰爭方式不是由於天才指揮官自由理智所創造；戰爭過程同樣不是由於指揮官主觀所決定。恩格斯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所發表的「反杜林」論文中曾經這樣說到「勝利根據於武器的生產，而武器的生產則又根據於一般

的生產，所以也就是根據於「經濟的力量」——「經濟的情形」或暴力所有的物質資料。」「任何東西，沒有像軍隊和艦隊那樣利害地依靠於經濟條件之上。」「沒有現代的經濟條件，決不能產生現代的軍備進行現代的戰爭；同時，現代軍備和戰爭的範圍，也就決不能超出現代經濟條件之外。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在一九三七年達到了最高點，一九三八年便已開始下降；就這一最高點來講，比較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的一九一三年，也不過出了百分之五十。但是，在軍事技術和軍備方面，可就遠遠地超過了這個比數。只就軍費負擔來講，由於帝國主義各國的軍備競爭而加到它們每一個公民的軍費負擔，在德國，一九三七年比一九一三年就高出了百分之七十。發達主要武器增加比數，前面已約略述及；再就質量提高這一點來講，也就隨而提高了製造的成本和它本身的消耗。只就飛機的製造成本來講，一九三九年比一九一三年至少高出了百分之五百；就飛機燃料消耗來講，至少高出了百分之二十。益以現代軍事技術驚人的毀滅力量的激增，這就使現代戰爭的消耗，達到了難以想像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和消耗相差懸殊，而這一消耗又是難以想像的巨額數量——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難維持這樣規模的一個長期戰爭和長期消耗。

就經濟動員來講：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僅只工業動員就要在戰爭爆發後的一年到一年半才完成；現在却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準備，有些國家平時就準備隨時可以轉為戰時經濟體系，有些國家則平時便已經是戰時經濟體系了。這樣，一方面是能夠更集中地充分發揮經濟力量，一方面也就更加縮小了它的持久性。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各帝國主義國家，必然的要瘋狂地擴充軍備，以遂行其掠奪壟斷的戰爭；可是它們的私有的無政府的商品經濟生產，又必然的不能適應它們的龐大軍備的要求。資本主義的發展，供給了大量的軍備；大量的軍備，提出了無限的消耗，促進了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也就加速和縮短了戰爭的過程。軍事技術的愈加發展，提供了更犀利更猛烈的武器，更縮小了空間和時間，提出了更劇烈更慘酷的毀滅，這也使得戰爭自然趨向於速決殲滅。工業的發展和帝國主義的集中壟斷性，已經是不可能並且必須裝備大量的兵員以從事戰爭；這就武裝和訓練了廣大的人民；戰爭未爆發以前極力阻止戰爭的爆發，戰爭爆發以後極力縮小戰爭的範圍和過程，這是廣大人民的要求；現在不但是要求，並且他們已經有了這種決定的權力和地位；這也就使得戰爭不能如指揮官們主觀所要求的那樣地自由地延長。當然，現代戰爭還不能想像到如同德意將軍們所說的那樣：以一擊之力，就能決定戰爭的最後勝敗；可是，戰爭之自然趨向於速決殲滅，以至消滅它本身，這却是

它自然發展的規律。

儘管英法的一些將軍們，認為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還是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一樣，因而主張採取消耗、持久、防禦和陣地戰；但是，客觀的現實總是變動的，歷史決不會重演，更不會如同人們主觀所想像的那樣地重演。經濟條件，軍事技術和人的條件，也許不會給英法以主觀所需的時間和空間。

預言錯綜複雜的戰爭將於某年月日爆發或結束，這是神話；可是，作為科學的推斷，這是允許和可能的。儘管英國的紳士們宣稱要進行十年的戰爭；但是，交戰國雙方以及可能參戰的一些國家，它們的經濟條件和軍備的關係，軍事技術和工業生產力的關係，現代進攻武器和防禦武器的關係等，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相較，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概念，就是戰爭很難得到同樣的時間。再就戰爭最重要因素的「人」來看，由於上次大戰的殘酷教訓，由於全人類六分之一得到解放的輝煌目標的存在，雙方的廣大人民和兵士，殖民地被迫的弱小民族，怕再也忍受不了漫長四年的時間。也許有些戰爭幸利的國家，抱着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同樣的念頭和認識，因而在事後追悔它們的貽誤戎機吧。

納粹德國的幾次戰例，更在事實上說明了：現代軍事技術的發展，更便利了速決和殲滅；即便在雙方軍備約略相等的情況下，只是相持以求久，以求消耗對方，結果是既不耐久，也消耗不了敵人。如果在迫不得已而採取戰約持久和消耗的情況下；也必須主動地積極爭取戰役和戰鬥的殲滅和速決；在這種情況下，相持更不是相持，消耗更不是對拚甚至反消耗了自己。

第三 制空權是制海？

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後，麥琴的觀點，仍然在軍事思想領域佔着很大的權威；認為在交戰國雙方，誰能統制了海上，誰就始終不會被擊潰，誰就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於是有些國家在海軍軍縮以後，跟着便又進行着造艦競爭；噸位和主砲口徑的加大，速度和航力的提高，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也有着日新月異；總以為掌握了海上的王冠，便可以永遠掌握着世界的王冠。但是，隨着軍事技術的發展，使得這種情形，便有着變動了。由於潛艇之出現，已竟使這王冠的地位受了震動；由於空軍的脫離附屬地位而突飛猛進，便最後決定了這王冠的命運。現代飛機航力的延伸，載彈量的增加，速度和昇空的高度，以及直下投彈和空中數雷技術的進步；以視海上一望無垠，龐大遲緩、防衛力量處於絕對劣勢的艦隊，已舉而括為囊中物。北歐戰役，納粹德國以絕對劣勢的海軍，在極端不利的戰局，並且遑遑地分散使

用；竟使得海上王冠促無能為力，提供了海軍戰史以空前的資料；這不是什麼行險僥倖，而是建立在優勢制空權的基礎之上；這不僅空前地改變了海軍的戰術，並且也空前地改變了海軍的地位。

在將來的戰爭中，也許會發生空軍對海軍的閃擊；只要是掌握了優勢制空權，其結果不難想像得到。我們更可以想像，在將來的戰爭中，也許會發生飛機和軍艦決鬥的事實；以重磅炸彈，高溫的燒夷彈和火焰，向海軍直撞；在這裏，無線電操縱的實際應用問題和其他的新武器且不必論；只就現代普通的航空技術和武器，加以樂於在戰爭中犧牲的「人」，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實。如果說四萬二千噸的新式無畏艦，其製造成本需要一萬萬美金；那末，用幾架飛機來對拚，在成本消耗的意義上，也要有利得多；更就生命線寄託在海外的島國來講，則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意義，更是何等的重大。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海上控制已竟不是簡單地在海上毀滅敵方海軍力的問題，而是海上和空中的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到：海上封鎖在現代已呈現了很大的障礙和弱點；它不但可以避過到空中的擊破，並且也存在着空中反封鎖的威脅。在現代戰爭中，空軍有着決定的意義，這是顯明的事實；但也決不如此意大利將軍們所說的那樣，空軍超越一切佔着惟一的地位，或者將攻擊的任務單獨地專責之於空軍。廣大的人類是生活在地面之上。廣大的鬥爭場所也就在地面之上；那末，武裝鬥爭的最後結局，自然也要在地面之上。如果說，各兵種的獨立，曾經是軍事領域的變革，並會呈現過異彩；那末，各兵種的密切聯繫和結合，更是現代軍事技術所決定和現代戰爭所要求。

第四 戰爭藝術還是運動藝術？

降落傘的開始應用，原不過僅為了航空員的安全問題；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開始應用它降落個別人員到對方的後方，遂行間諜和破壞等任務；由於蘇聯的軍事技術和戰略思想的發展，才將它發展到了戰術的範圍內。一九三六年蘇聯在莫斯科的大演習，已竟將一千二百人的步兵，一百五十挺機關槍和十八門大砲，翻翻地凌空落地；降落時間才用了八分鐘。可是，在這以後，還有許多的人士，抱着另外的一種見解。法國的朱耳耳便認為：降落隊形所佔面積之大，極易為敵人所發覺；降落部隊對降落點情況之生疏，極難奏效；着陸部隊極易為敵方迅速撲滅，殊無生還之望；飛機往返，易為敵方所截擊，損失重大；因而他認為這只是平時耀武之舉，戰時則絕不應輕酒戰士之血。赫德在去年尚認為在西歐特別是在英國，這是未必有的事情。有些人士甚至提抱着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對空軍的觀點一樣，認為這只是體育運動範圍內的藝術。因而有些國家直到最近還沒有正式的降落部隊，甚至連個別的降落技術也都沒有。但是，荷比戰役的事實，已竟說明了這決

不是運動藝術而是戰爭藝術；並且這一藝術在現代戰爭中，佔了重要的位置；它可以獨立地和國境會戰同時佔領對方的京城和要塞；它不是蓋酒戰士之血，是有重要的收穫；現在聯軍方面的人士，也不得不承認，戰事之所以失利而不是由於他們的聯軍作戰之不英勇，不是由於他們的指揮之不佳，而是由於德國的空軍，機械化部隊和降落部隊起了很大的作用。世間是有些人們，總要等到鐵錘落到他們自己的頭上，才肯承認鐵錘是鐵做的。

X X X

納粹德國所進的戰爭，和它的對方同樣，是爲了爭奪殖民地，爭奪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和人類的幸福沒有絲毫關係——包括它們的自己國內；它們的廣大的人民和兵士，只是在一時的麻醉和壓迫之下從事戰爭；它和對方的廣大人民，更是處在利害矛盾的地位；響應它的也只是對方的少數民族敗類；在這種情況下，納粹德國所採用的降落戰術，——以至它施行的全部份的「閃擊戰」——雖然已經是開市大吉；當然，我們還不會想像到已經發揮了它的高度效果。

第五 國防建設，戰略方針的參考。

德國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失敗後，受到了凡爾賽條約的重重束縛；大量的軍備被解除了，陸軍限制不得超過十萬，軍艦限制不得超過一萬噸。但是它在比較發達了的工業和軍事技術基礎之上，海軍受到了限制，却發展了大量的空軍吸收了降落技術；陸軍受到了數量的限制，却發展了大量的機械化部隊；就在這基礎之上，在軍事方面獲得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初步勝利。但是在國防建設方面，却也提供了一些資料。被壓迫的民族國家是可以得到解放，可以減少另一方面的痛苦；問題就在：要撤取世界人類最先進的一切事物，而揚棄其陳腐的部份。還在國防建設方面，也是一樣；如果只是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背後亦步亦趨；那就，既然要遭受雙重的痛苦，亦且不會趕得上。

社會的基礎在經濟，當然國防建設的基礎也在經濟；不擺脫帝國主義者的經濟桎梏，很難想像到建設一個真正的現代國防。當然，正確地運用外資和完全依賴外資是兩件事情。

依靠輸入的軍用品，斷難建設良好的軍備；一方面資金繁鉅運輸艱難時，不易得到巨額的數量；同時，一般地講，也很難得到品質優良的武器。記得中國在滿清和北洋軍閥時代所買的犀利武器，常常是缺七少八的廢槍爛砲；這不只是營私中飽的問題，也是資本末的問題。目前聯軍方面雖然也從美國買到了不少的武器；但是距離它們所期望的數量和時間，還是相去很遠。國防建設必須建立在自己的工業首先是軍事工業之上。在軍事工業的建設

上，決不應單純站在經濟觀點上，同時也必須站在軍事觀點上。現代軍事工業建設，在軍事方面要求的一部份是：要求分散，要求安全的地區，要求良好的地形，要求足夠的防空設備。法國國防力量薄弱的北境平原上的一部份軍事工業，是未能適合這種要求的。在將來的戰爭中，那些集中的軍事工業，也許要遭到難以想像的毀滅。

沒有現代的科學基礎，就不能有現代的國防；科學雖然是國際性的，但在軍事技術這一部份，至少要保持着部份的秘密；因此沒有自己的科學和技術專家，也就很難想像到建設良好的國防。有些國家，自己的科學和技術專家已經是爲數甚微；而還爲數甚微的科學和技術專家，却又是生活沒有保障，工作沒有保障，或者用非所學，或者無由竭其所長；這樣，來談國防建設，也就不會得到良好的效果。

現代戰爭，即使採取防禦，也必須具有攻擊方面同樣的武器。英法戰前的國防建設，即使站在防禦的立場來講，也不能說是優良。

遲疑動搖舉棋不定，是軍事之大忌；還在戰略方針方面，表現的尤爲顯明。英法已竟爆發了對德的戰爭，却開了歷史的先例，打雷不下雨或者雷聲大而雨點小，仍然時時企圖規避這一個戰爭，而轉爲另外的一個戰爭。基於它們那樣的戰略，因而在戰略方針方面，也就表現了動搖遲疑；處處受納粹德國以先制之利，因而遭受了戰爭初期的嚴重失敗。在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特別是在戰爭已經爆發之後，就要堅決地貫徹戰爭的目的；任何的動搖和遲疑，都要遭受嚴重的以至最後失敗的殘酷待遇。

第六 不變的一件事。

由於「閃擊戰」——這一在現代軍事技術基礎上所產生的新的作戰方式——在事實上所提供的資料，在軍事藝術領域內將更廣泛地發生空前的變革，舉凡國防建設，軍隊組織，戰略戰術，戰鬥勤務等等，都要有巨大的變動。當然，這也不是說「閃擊戰」改變了一切；我們且舉重要的不變的一件事來講：

儘管一些唯武器論者或者是精兵主義者，他們都爲決定戰爭勝負的只有武器；或者企圖以死的絕對服從的機械，來代替活的靠不住的「人」；但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畢竟還是有生力量的「人」。戰爭是人類在一定的發展階段——階級社會——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它是「人」的事情，自然要「人」來解決。沒有「人」，所有的經濟力量軍事技術便無所依托以發揮其能力；其實，也就根本無從產生。當然，也不是如同另外一些人們所說；精神決定一切，只要有精神旺盛的「人」，便能夠執挺以握現代之堅甲利兵。這只是說：軍事技術的發展，決不會減輕了「人」在戰爭中的作用；相反的，只有更加重了它的意義。高度發展的軍事技術，只有和高度政治質量

的「人」結合起來，才能夠充分發揮它的效能，才能夠獲得戰爭最後的勝利。

現代戰爭已經不是單純的武裝鬥爭；所謂全面戰爭，全民戰爭；所謂全體動員，全國動員，已經是舉世周知的事情。如果說過去的戰爭，還有大部份的人，站在戰爭以外和對戰爭漠不關心；那末，在現代戰爭中，這已經是不容有的現象。這就說明了：在現代戰爭中，不論在量的方面，都大大增加了「人」的意義。再就一兩件事實來加以觀察：如果在軍事技術還很低劣的時候，一個工人可以供養若干士兵；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消耗最大的戰爭最後一年，平均要一個工人供養一個士兵；那末，在現代戰爭中，平均供養一個士兵至少需要六個工人，一輛坦克便需要七十個人來供養，一架飛機便需要一百二十五個人來供養。由於現代戰爭使大量的人員脫離了生產，也就需要保障足夠的農業生產，來供給大量消耗的食品。不論是工人或農民，如果不使戰爭的利害和他們的利害一致，如果不從政治和經濟方面來提高他們的生產熱忱；那末，大量的生產品是不可能在刺刀下面生產出來的。更就直接從事武裝鬥爭的兵員來看：事實已經證明，現代戰爭即便在兵員的數量方面，也決不因軍事技術的發展而減少；所謂以小型的機械化部隊來代替大兵員作戰的理論，已經證明了只是脫離現實的空想；而運用現代複雜繁雜的武器，經歷現代戰爭更加殘酷艱危的環境，也就更加重了兵員質量的意義。這一切說明了軍事技術的發展，不論在數量和質量方面，決不會減少了「人」在戰爭中的意義；「人」是戰爭的主要因素，這一件事實是不變的。

儘管人們——十可以的納粹領袖的著作，作為文字的代表——拚命的壓抑勞苦軍人以瘋狂地從事戰爭，在戰爭中又正有所借口而更拚命的進行壓榨——我們已經看到交戰國雙方以及一些非交戰國，在戰爭爆發前捐稅已經是如何的奇重，在戰爭爆發後又是如何驚人地增加預算發行公債通貨膨脹提出一些五花八門的捐稅以及無限的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資等——以為在現代高度發展的軍事技術和戰爭速決的條件下，任何問題都可以按照我們主觀所想像的那樣來解決。但是，廣大的勞苦羣衆，自有其忍受的限度和解決其自身問題的權力和教訓。如果說在資本主義世界裏，在平時勞苦羣衆早已掌握了經濟的命脈，那末，在現代，在戰時勞苦羣衆並已更確實地掌握着戰爭的命脈。恩格斯於一八八七年在一本小冊子的序言裏說到未來的世界大戰，這樣寫着：「……青島士德意志如果要戰爭，除了世界大戰之外，已再不可能了。而這個大戰，其範圍及其猛烈，都是向來所夢想不到的。八百萬至一千萬的兵士，將互相屠殺；在他們互相屠殺時，把整個歐洲吞下了，把什麼東西都毀去，比一大羣蝗蟲還厲害。三十年戰爭的物質破壞，縮短為三四年，而且遍及整個大陸；……結局整個破產，舊的國家及其傳統的國家智慧，崩潰

到這樣的地步，一打一打的王冠在路上滾着，沒有人去拾；絕對不可能預知戰事將如何結束與誰將勝利；只有一個結果是絕對確定的：大家都筋疲力竭，並創立了工人階級最後勝利的條件。……戰爭也許把我們暫時推向後面去，我們已得到的地位也許有許多會被搶去。但是，當你們把你們所不能再統制的力量解放出來時，戰事就將自然發展；到了悲劇的末了，你們就將滅亡，而無產階級的勝利，或已完竣，或總是免不了的。」五十年以前，偉大革命導師的科學預言，已竟為二十幾年以前的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證實。現在，一些人們的主觀想像，交戰國雙方的誰勝誰負，我們且不去管它吧。

五、日本帝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能採用

「閃擊戰」到怎樣的程度？

由於納粹德國幾次「閃擊戰」的勝利；顯然地，要給予瘋狂的侵略者們以很大的刺激。我們已經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它宜稱也要在鄂北採用「閃擊戰」。究竟它所採用的「閃擊戰」能否和納粹德國所施行的規模相同？能否收到同樣的效果？顯然地，這是不可能。至於它究竟會收到怎樣的結果？那就要從兩方面來觀察，來決定。

儘管日本帝國主義者遠於一九三一年侵佔東北時，便已轉入了戰時經濟體系；儘管它的軍事經濟特別強化；但是，這裏存在着一個問題：就是，不管它的軍費指數佔的怎樣高，不管它的軍事工業怎樣的畸形發展，不管它的戰爭準備怎樣的久；可是，它的軍備總不能超越了他的經濟條件的限度。日本帝國主義的各種原料特別是軍需原料的匱乏，資本主義的晚成早熟，重工業的特別脆弱；這就限定了它不能有大量的現代軍備。如果說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強國的話；那末，這一個強國的特點，便是它的軍用品在平時也要大量地依靠輸入。在無落日的資本主義國家——大不列顛帝國，它的國防建設還要遵循着這樣一個原則——發展海軍軍力到最大限度，限制陸軍軍力到最小限度。而這樣一個在各方面都不够比擬的日本帝國，却一方面要成爲一個一等的陸軍國家，同時又要成爲一個一等的海軍國家；這就使它的軍備更大地受到了限制。按照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能力，即便在不連受到封鎖的情況下，它的第一種的飛機和坦克，也各不會超過一千以上。這還是指着它在有決定意義的戰爭中，所能使用的最大數量；當然，在侵華戰爭中——至少是現在——還是這種情況。

日本帝國主義在粵南在桂南的登陸以至佔領廣州南寧，雖也可以說是一種「閃擊戰」；不過，它的條件並未具備。現在我們就它未曾採用過的空中潛陸技術來加以觀察。如果按照德國人的估計，在一九三八年蘇聯紅軍便已

經有現役的降落傘部隊至少七萬人，納粹德國那時才有一個聯隊——據法國人的估計，現在的數目則早已超過；那末，在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直到最近便連這種正式部隊也還沒有。當然，由於納粹德國勝利的刺激，也許它正在積極的組織；不過，這種部隊却非短時間內所能訓練好的。再就飛機着陸來講：在具有現代軍備而雙方不甚懸殊的作戰中，用一個現代的步兵營施行飛機着陸；包括掩護和輸送，就需要各種飛機約五百架。在目前敵我軍備對比的情況下，日寇當然不須這樣數目；但在它的第一線飛機總數的限制下，也就決定了它不可能使用更大的兵力。并且這一種着陸方式，首先就受到了着陸場的限制；不能夠自由地來應用。

「閃擊戰」主要的軍事技術基礎，是飛機、坦克和降落技術；而日寇在這些方面是這樣的貧乏，戰場則廣袤幾千公里；那末，它所能組成的「閃擊戰」的規模，既然不能夠和納粹德國相比擬，實在也就微弱地很不足觀了。再就戰爭最重要因素的「人」來看：日寇廣大士兵的反戰情緒的高漲，甚至在空軍中也發生了散發反戰傳單的情事；以這種情緒的「人」，來進行更加艱苦困難的任務，也就更難達到它所期望的效果。

因此，我們可以說：就日寇方面所具備的條件來講，它決不可能施行近於現代水準的「閃擊戰」；即使它在各方面的努力，也不會收到超越戰術範圍以上的效果。當然，在實際上日寇收到的效果怎樣；還要看我們自己的條件怎樣，來予以變動，來予以決定。

抗戰三年以來，由於廣大人民的憤發，由於廣大士兵的英勇，由於最高統帥以及各英明將領的領導，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廣大人民和士兵反戰情緒的高漲；已經使我敵的力量和形勢，有了改觀。這一些說明了，戰爭發展的形勢，基本上是利於我而不利於敵；這應該大大地減弱了敵人繼續進攻的力量，自然也就縮小了敵人新的作戰方式——「閃擊戰」的效果。當然，這些一般的條件還不能夠決定這種特殊的新的作戰方式的效果；我們還必須針對這新的作戰方式的特性，來決定我們自己應該採取的對策。

施行「閃擊戰」的先決保障條件，是秘密和突然；針對這一特性，除了加強專門的偵察工作以外，就加重了廣泛地組織訓練特別是武裝廣大民衆的要求。任何的軍事準備和行動，總不能說出廣大民衆的視聽以外；如果真正有了健全的民衆工作，那就使得深入異國領土的敵人，所有的任何準備和行動，都很難達到它的秘密的目的；即便是突襲而迅速的閃擊，也要隨時隨地遭到抗拒，至少也要大大地減少了它的突然性。立國於現代——特別是在「閃擊戰」實現以後——而不實行武裝廣大民衆，這至少是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有力武裝的一部份。

了解情況為規定決心和實施行動的基礎；這在突然迅速進出的閃擊，其意義尤為重要。沒有漢倫、吉斯第、丹森堡、穆塞脫等所代表的少數民族敢鬥的事前和當事的供給情況和響應；納粹德國幾次閃擊戰的勝利，至少也不會有這樣的迅速和順利。在我們，當然不應該把漢奸敗類的活動能力，作過份的估計；但是，在我們抗戰營壘內，在思想和行動上，還存在着一些響應日倭和汪賊的份子，這也是我們不必否認的事實，僅只為了對敵人將要施行的閃擊，也應該更加開展和深入反汪勤好的運動。同樣，國內磨擦甚至武裝磨擦的發生，顯然地，給予敵人的政治進攻和軍事進攻的障礙和乘機，尤其在敵人宣傳即將採用「閃擊戰」的時候，更需要國人的深刻警惕。

在具有發達的現代軍備而雙方不甚懸殊的戰爭中；由於「閃擊戰」的發展，將來或許使戰略思想簡單化了許多。也許會發生如同歐西用火器決鬥的情形；開始即以全力向着對方的要害——軍隊主力或閃擊部隊，經濟資源，軍略要點等——互相閃擊；其結果或是先發制勝，或是兩敗俱傷。現在我們對敵人的閃擊，至少還不能大部採用這種戰略思想。我們在仍然處於劣勢的戰略相持階段中；仍然應該主動地積極爭取戰役和戰鬥的攻勢、速決和殲滅，更廣泛地發展游擊戰爭；這樣來消耗、分散、箝制和疲憊敵人，更加深敵人組成閃擊部隊和實行閃擊的困難，或抵消敵人閃擊的勝利。

對敵人的閃擊的挺進部隊；在兵力兵器允許的範圍內，當然要堅決地儘速予以撲滅；如果這些條件沒有具備，則毋寧首先予以擾阻、疲憊、消耗和局阻，然後尋機予以驅除。此外，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以提高作戰情緒，鞏固勝利信心；加強部隊的游擊戰術教育，使能在有利情況下集中突擊，不利情況下分散作戰以免遭受重大損失與殲滅；充實部隊的裝備和補給，使能進行相當時間的獨立作戰；這樣，才能勝利地進行由於「閃擊戰」的出現而加劇的互相包圍的糾纏作戰。餘如，改進戰鬥勤務以適應立體作戰；加強軍略要點的警備以防敵襲；分散軍事工業，加強防空設備以保存軍事經濟等；也都是當務之急。

六、結論。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仍然是交戰國雙方爭奪殖民地、爭奪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戰爭，它和人類幸福沒有絲毫關係；雖然交戰國雙方的人和兵士，都還是在欺騙壓迫之下從事戰爭；雖然響應納粹德國的只是少數民族敗類；雖然這一戰爭的真面目武裝鬥爭方在開始；但是，納粹德國所施行的幾次「閃擊戰」，在軍事方面已經呈現了相當的成就，在事實上提供了軍事領袖若干的有力資料。這是值得我們參考研究和借鑑的。

聯共(布)黨史研究資料

八十二

一九〇五年的工人代表

蘇維埃(下)

S. 科庫希金作
戈寶權譯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工人的主要核心，就是鐵路工人，他們的人數，從日俄戰爭開始時起就激烈地增加了。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鐵路工人，從一九〇五年的一月起，就積極地參加了與沙皇政府的鬥爭，一月十五日，修理鐵路的工人罷工了。罷工是潮水般地發生着，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作某些讓步。

七月五日，印刷工人罷工了。十月七日，鐵路工人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十二月六日，當革命運動最高漲的時候，就組織了工兵代表聯合蘇維埃，這時候鐵路、西伯利亞第三補充營和警衛部隊的兵士，都附合了起義的工人，在蘇維埃的領導之下（這個蘇維埃主要地是由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就佔領了省立印刷所，十二月十日就出版了第一期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工人報」，在這個報紙上公佈了蘇維埃關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決定。

這個報紙，是蘇維埃及俄國社會民主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委員會的印刷機關報。蘇維埃的主席是烏立支基。在蘇維埃最初的某次會議中，蘇維埃就通過了下列的決議：

「一。由於聯合蘇維埃宣佈了完全的言論自由，沒有一個政權能有權要求檢查任何印刷文件，禁止印刷所的管理人及負責人向當局請求出版的許可權。

「二。……在蘇維埃之下組織一個準備選舉的委員會，將城市劃分為幾個選區，確定有選舉權的居民人數等等。

「……四。為了加速行動，聯合委員會委託鐵路工人與職員的選舉委員會負責管理這個工作，鐵路上一切負責人員，應該在最初的要求之下向委員會的代表報告自己的活動」（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西伯利亞的討伐隊」，一九三二年社會經濟書籍出版局第十一頁）。

十二月十一日，蘇維埃公佈了關於市議會選舉的宣言。在蘇維埃領導之下，舉行了集會，和武裝遊行示威等等。蘇維埃實際上已成為城中的唯一政權。它有着工人和兵士所代表的真正的力量。舊政權的代表人不得不重視蘇維埃了，可惜地，就是沒有把他們逮捕起來。在城市裏面，樹立了由工人自衛隊和鐵路營的兵士們所維持的革命的秩序。

那些在行動上還自由的舊政權的代表人，就採取了各種步驟來鎮壓「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共和國」。他們迅速地把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和奧姆斯克團的兵士調進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們就把印刷所佔領，城市裏宣佈了戰時狀態。起義的人們把自己的力量都集中在鐵路修理廠裏，在當地聚集了所有不多的軍火儲藏。十二月二十二日，政府的軍隊把鐵路修理廠和城市的聯絡切斷了，並開始用步槍和機關槍向他們射擊。力量上顯然是不平衡的。被包圍的人們，他們雖然會英勇地擊退了正規軍的進攻，但他們的軍火和食糧已經盡竭了。他們也無處可以得到補充。一九〇六年一月三日的十二點鐘，工人和兵士們被迫投降了。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省長康普羅特，並且立即通知前子手都諾伏，說「在冬天有四百二十三個工人與兵士投降，所有的人，按臨時省長將軍的命令一概逮捕，解除武裝，並待舉行審問」（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西伯利亞的討伐隊，第九十頁）。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武裝起義的弱點，就在於：

- 一。起義的人所採取的，是防禦的策略，而不是進攻的策略。
- 二。蘇維埃沒有逮捕警察局的代表人，使得他們能夠順利地聚集力量來消滅起義。
- 三。蘇維埃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奪取軍火庫。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蘇維埃稱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共和國」，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在布爾塞維克的影響之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工人與兵士的起義，是有許多縣份的農民支持的，在康斯克縣的農民起事達到特別高的水平，他們取消了巡查和警察署長，把所有的土地奪到自己的手中來，並且拒絕納稅，列寧關於農工聯盟的思想，是為羣衆所把握住了。

但是蘇維埃鎮壓了城市的工人與兵士的起事之後，政府也鎮壓了農民的起事。

赤塔蘇維埃

赤塔工兵代表蘇維埃的特點，就是孟塞維克在此地絲毫沒有什麼影響。蘇維埃是在布爾塞維克組織的領導之下，這個組織是一九〇二年在雅羅斯拉夫斯同志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他在當地一直工作到一九〇三年被逮捕為止。

布爾塞維克不僅在工人中間，同樣地在兵士中間也展開了廣大的工作。赤塔的革命運動，在一九〇五年一月時是特別的強烈，在當地，也正像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一樣，主力是鐵路工人。

一九〇五年九月九日，由俄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建議，就召集了「外貝加爾鐵路工人的組織的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就積極地抵制開會的策略，討論孟塞維克的策略和他們所編輯的「火星報」，並號召所有的鐵路工人同時進行罷工。

由於這個號召，在一九〇五年的十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所有的鐵路工人就宣佈罷工了。工人們帶着武器奪取了車輛。

十二月十六日，工人和鐵路營的兵士，通過了召集立憲會議，為推翻專制政權和建立民主共和國而作共同鬥爭的決議，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赤塔的各企業中，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十二月二十二日，建立了兵士與哥薩克兵的代表蘇維埃，他們同樣地也提出了要求召集立憲會議，和保障公民自由等基本的要求。

十二月七日，第一期的「外貝加爾工人報」出版了，在這個報紙中指出：這個報紙是在鬥爭中的無產階級的機關報，它有以下的各項任務：（一）宣傳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使它成為廣大羣衆所有的遺產；（二）幫助工人的革命鬥爭。

十二月十六日，為了要求自阿克士也夫斯克監獄釋放「布魯特號」海軍兵士的工兵代表團，從赤塔出發了，領導這個代表團的，就是赤塔蘇維埃的領導人V. K. 庫爾拉托夫斯基和庫斯士希科——伏留若尼奇。

十二月二十一日，工人帶着武器奪取了車輛，在同一天，赤塔市議會看到蘇維埃具有真正的實力，不得不把郵局和電報局交給蘇維埃了。

蘇維埃成了城市的完全的主人。他們解除了警察的武裝，武裝了無產階級和創立了戰鬥工人自衛隊，並且釋放了政治犯。蘇維埃採取了各種方法來加速瓦解軍隊，因為政府害怕兵士們起義而緊握住軍隊。

工人、兵士及哥薩克兵代表蘇維埃，向外貝加爾鐵道的職員，發出了下列一個電報：

「同志們，當他們把兵士們運送到滿洲去吃槍彈和砲彈的時候，鐵路的當局用盡一切力量儘可能地多運送些軍隊去。現在，當滿洲的軍隊渴望要回國時，我們的當局違法地遲延下去。政府的官員不願意兵士們回返祖國，但是他們嚴重地錯誤了，西伯利亞鐵道的工人和職員會自己去援助滿洲的軍隊的」（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六年的西伯利亞的討伐隊，第六十二頁）。

蘇維埃在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之下，組織了抵抗開能爾夫和梅察爾——柴科邁爾斯基所領導的討伐隊，他們是從兩方面來圍圍着赤塔。但是赤塔的工人得不到外來的援助，他們不能來抵抗「劍子手」，赤塔就終於為政府的軍隊所佔領了。一月二十日，在城裏就開始了逮捕，一九〇六年的一月二十二日蘇維埃就停止了自身的存在。布爾塞維克躲到地下和繼續進行工作。赤塔的蘇維埃會和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委員會，一齊向外貝加爾的哥薩

克兵發表一個宣言，號召他們奪取田地，蘇維埃又為省裏的布路克蒙古人
民發行了一種特別的宣傳文件。
這一切都指明出，西伯利亞的蘇維埃，同樣地也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專政
的萌芽。

「布爾塞維克把蘇維埃看做是革命政權的萌芽。他們認為蘇維埃的
力量與意義，完全決定於起義的力與勝利」（見「聯共（布）黨史簡
明教程」俄文本第七十五頁）。

最初，蘇維埃是作為罷工鬥爭的機關而產生的，但是在革命的進程中，
它們不可避免地轉變為武裝起義的機關。轉變為新的政權的機關（目前還
不過是萌芽的形式）。工人代表蘇維埃用革命的方法奪取了印刷廠，組織了
戰鬥自衛隊和領導與沙皇制度的鬥爭，進行了逮捕官員，號召人民不向政府
納稅及購買公債，與黑色百人團的活動作鬥爭，創立人民法庭，實行八小時
工作制，出版報紙及發表宣言等等。兵士代表蘇維埃選定了軍官，選派了自
己的指揮官來代替他們，兵士和工人們團結了，他們拒絕向舊軍隊開槍射擊
，其中有些人還跑到起義人民的這一方面來，農民代表蘇維埃號召農民奪取
地主的土地，不向政府納付租稅等等。

蘇維埃在革命更加高漲的時期的產生，指示出舊政權懦弱無力，不能按
照自己的願望來阻止新的政權和人民的政權的萌芽的產生。但同時，正如烏
拉地米爾·伊里奇所指出的那樣，這個「新的人民的革命政權（工人、農民
、兵士代表蘇維埃等等），還沒有充足的力來代替舊政權」（見「列寧全
集」俄文本第十二卷第二十頁）。

為了最後戰勝敵人，蘇維埃的存在還是不夠的，人民應該有武器拿在手
裏，沒有這個武器是不能從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專政到整個政權的。因此烏
拉地米爾·伊里奇說道：

「為了組織起義，『蘇維埃』和各種羣衆的組織還是不夠的。它們
必需去團結羣衆，作戰鬥的聯合，傳達黨的政治領導上的口號（或者是
得到黨的同意而提出的口號）提議和吸引羣衆等。但是從根本上講起來
，在直接地組織戰鬥的力量上，和組織起義上，它們還是不夠的」（見
「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四〇〇頁）。

除去蘇維埃之外，還必須有蘇維埃所能依靠的軍事組織，這種組織能領
導起義和保衛蘇維埃。沒有這種武裝的力量，蘇維埃立刻就會被舊政權，被
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所鎮壓。更進而為了爭取新的、革命政權的勝利，就必
須有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來領導蘇維埃。布爾塞維克最積極地參加蘇維埃的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審查證字第一九九〇號

工作，並使它所有的堅決性來與蘇維埃的「非黨性」作鬥爭，列寧在一九〇
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新生活報」上寫道：

「打倒非黨性！非黨性時常並且到處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和口號」（
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八卷第四〇〇頁）。

布爾塞維克參加蘇維埃的組成，保持了黨的獨立性，凡是布爾塞維克在
蘇維埃中起主要動力的地方（舉如在莫斯科及其他各城市的情形），當地的
蘇維埃就準備和領導武裝起義，逮捕警察局的人員，奪取印刷局等等。布爾
塞維克把蘇維埃變成組織和領導武裝起義的中心，變成發起人民革命政
權的機關。

孟塞維克是完全以另一種態度來看蘇維埃。

「孟塞維克認為蘇維埃既不是革命政權的萌芽機關，也不是起義的
機關，他們把它看做是地方自治機關，類如民主化了的城市自治管理會
」（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俄文本第七五至七六頁）。

他們儘量地，使得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中的政權，轉到資產階
級的手裏去，並且和資產階級採取一切的方法來反對把政權轉到蘇維埃的手
中去，孟塞維克在彼得堡的蘇維埃中奪取了領導權，使它來反對起義，並使
得沙皇制度有可能性來集力量來粉碎革命。

孟塞維克在沙皇制度戰勝了革命之後，即向無產階級提議組織一些所謂
執行委員會，選舉會議來「代替」被粉碎了的蘇維埃。

孟塞維克更一度地以他們的提議來着重指出，他們所了解的蘇維埃——
並不是新的、革命的、真正的人民政權的萌芽，而是和資產階級地主政府同
時並存的自治機關，並且還是這個政權的附庸物。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關於孟塞維克這個提議會這樣寫道：

「首都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在無產階級的戰
鬥組織上，沒有堅久的支柱，假如我們用選舉會議或各種代表會議來代
替這些蘇維埃，這時是用口頭上的支柱來代替戰鬥的支柱，用似是而非
的議會的支柱來代替革命的支柱，這正有如我們用畫在卡通畫上的大炮
來代替不足數的大砲一樣」（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九卷第十五頁）
。列寧更進而發揮了這個思想，他講道：「羣衆罷工和武裝起義，它們
本身就在議事日程上提出了關於革命政權和專政的問題，因為這些鬥爭
的方法難免地要經過——最初是地方規模的——驅逐舊的政權，無產
階級與革命階級奪取政權，驅逐地主，有時還奪取工廠等等。上述這個
時期中的羣衆革命鬥爭，把世界組織史上從未見過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實
現出來，細它而起的，就還有兵士代表蘇維埃，農民代表蘇維會及其他蘇維
埃等等」（見「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五卷第四三三頁）。